

重探台灣的政體轉型：

如何看待 1970 年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

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挑戰「由外而內的正當化」的流行說法，指出國民黨政權在 1970 年代初並非藉由強化與地方派系的結盟來化解正當性的危機。從象徵鬥爭的觀點重構這段歷史，本文指出，外部正當性的危機雖是引發轉型的重要觸媒，但內部的脈絡才真正決定了轉型的方向。而轉型之所以能在沒有大眾動員的情形下出現，除了適逢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繼承，以及國民黨必須解決長久以來權力不足的難題外，也跟它一向以來的正當化論述、當時人們如何界定現實與危機，以及公共領域中的異議聲音有關。革新保台路線之所以能確立並化解危機，即因它能暫時統一各方的立場。儘管 1972 年的轉型不符合政體轉型模型所謂的「自由化」或「民主化」，卻導致中央政治參與機會的開放，進而促成全國性反對勢力的形成，實是戰後政治轉型真正的起點。據此，本文比較了從象徵的面向掌握正當性／權力的進路，與視正當性為「有權者之間的相互認可」兩者的優劣，呼籲重視台灣獨特的脈絡，反省政體轉型模型的適用性，摸索台灣自己的理論。

關鍵詞：正當性、權力、由外而內的正當化、政治轉型、革新保台

Reexploring the Regime Transition in Taiwa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KMT's Legitimation in the Early 1970s

Chih-Chieh T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popular opinion that the KMT regime solved its legitimacy crisis in the early 1970s by strengthening its coalition with local factions. Reconstructing this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struggl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crisis of external legitimacy was only a catalyst to thi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t was the internal context that determined the directio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act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without a mass mobilization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historical conjunction of the power succession inside the KMT regime. But this also must be attributed to the KMT's ongoing predicament, which was grounded in its lack of sufficient power, its previous discourse of legitimation, people's definition of reality and the crisis in the moment, and dissenting voices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 discourse "defending Taiwan through reform" came out as guideline and solved the crisis successfully only because it could temporarily unite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Although thi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was by definition neither liberalization nor democratization, it did lead to an opening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level of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further engendered a nation-wide opposition. In this sense, the transformation was doubtles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aiwan's postwar regim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advantages of an approach that grasps legitimacy/power from a symbolic dimension in comparison to one that considers legitimacy as a "mutual recognition between power-holders." Meanwhile, it emphasizes that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consider Taiwan's particular context seriously, to reflect up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ransitological model, and to develop theory.

Keywords: legitimacy, power,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symbolic struggle

一、緣起：重新思考「由外而內的正當化」的必要性

「台灣的政治轉型始於何時？又是如何發生？」無疑是了解台灣戰後政治發展的關鍵問題。1989年，王振寰發表〈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一文，是國內最早以實際研究來解答此問題的嘗試。¹該文指出，在1986年「自由化」的轉型之外，1972年也曾有過一波「台灣化」的轉型。王氏選擇從「有權者之間的相互認可」的正當性(legitimacy)概念切入，藉由探討國民黨政權因應危機的正當化策略來比較兩次轉型的異同。他指出，1972年的轉型源自喪失美國支持的外部正當性危機，國民黨以由外而內的正當化，尋求台灣社會更大的擁護，尤其是藉「本土化」²政策結合台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精英，來化解危機，所以轉型的結果只涉及政權內部的調整。相對地，1986年的轉型涉及的是由上而下的正當化，在投資率下降，加上繼承危機和民間社會挑戰的情況下，國民黨被迫走向政治自由化，嘗試透過把非精英群體吸納進政治體制內，使衝突制度化的方式來化解危機。其中，反對運動是促成此一轉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由於該文率先回應「台灣的政治轉型始於何時？又是如何發生？」的關鍵問題，成功地結合了理論討論與經驗研究，清楚描繪1970年代以來台灣政治發展的歷史圖像，並且把反對運動的影響納入考慮，為研究國民黨政權、地方派系和反對運動的互動提供一個深具洞察力的詮釋架構，因此不但常為後繼研究者援引為對過去一般背景的了解，更影響了他們提問的方向與觀察的架構，相當程度決定了日後相關研究的基調，有著深遠且跨學科的學術影響力。

1 在同一期刊物中，吳乃德(1989)則在理論上探討民主轉型的研究取向，正式將以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為代表的政體轉型研究引介到國內。

2 本文採用當時習用的「本土化」，而非王氏所用的「台灣化」一詞，因為在1970年代初，就「台灣」作為象徵來說，相當程度上仍是個禁忌，是國民黨政權盡量避免與壓抑的對象。

然而，筆者發現，該文隱藏著一些矛盾和問題，並往往因此誤導讀者。例如，在描述從 1979 年國民黨鎮壓《美麗島》黨外勢力，到 1986 年政治轉型這段歷史時，王振寰(1989: 98)提出「退縮正當化」的概念來解釋：

所謂退縮的正當化是指國民黨政府非但不承認新崛起的社會力量及其要求，反而去壓抑與反擊，並為了合理化它對新興社會力量的壓迫，進一步的強化與尋求它原支持者的認同與支持。這一退縮的正當化措施，基本上包含三個面向：第一，強化與地方派系的關係……期透過選舉的勝利以合理化其統治和對反對人士的鎮壓。第二，強化與國際和國內資本家的關係，企圖透過國際化與自由化的經濟策略，創造新的經濟景氣，並由此合理化其對反對運動的鎮壓……第三，在此時期，軍人力量高漲，以維繫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成長。（底線筆者所加）

但在倪炎元(1995: 19)比較韓國與台灣政體轉型專書中，王氏的主張卻被如此援引：

1970 年代以後……國民黨所採取的策略即是強化對內的正當性，尋求社會的支持，以維繫其統治。特別是在 1972 年以後，國民黨展開了「台灣化」與「本土化」政策，與台灣的經濟和社會精英加以結盟，而若干未被吸納或被吸納而無發展機會的政治精英，逐漸投入反對運動。特別自 1977 年以後，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反對運動興起，對國民黨權威提出挑戰，使得國民黨更加強化與本土精英間的關係，此一「退縮正當性」的成功，使國民黨在中美斷交的衝擊下，並不選擇吸納反對運動的精英至體制內，反予以鎮壓。（底線筆者所加）

在王文中原本強調動作、過程面的「退縮正當化」，不但被倪氏改寫成「退縮正當性」，而且論證的邏輯也顛倒了過來，本指國民黨鎮壓反對運動後才不得不採取「退縮正當化」的措施，強化與原支持者的結盟，以合理化先前的鎮壓，卻被誤解為因為「退縮正當性」的成功，所以國民黨敢於進行鎮壓。

其實，讀者會將王振寰的觀點誤讀為：自 1972 年以來國民黨採行的即是「退縮正當化」措施，起因於王文前後不一的陳述方式，例如：

由於有 1972 年以後向內強化其正當性的作為，所以 1978 年中美的斷交，並未造成國民黨政府因此也將黨外吸納入體制之內，以強化它與臺灣社會的關係。因為它已強化了與之合作之政經精英的關係，黨外運動對它而言，是擾亂正當秩序的源頭。國民黨政府對黨外反對運動的鎮壓及強化與政經精英的結合是不進反退的策略，而這一退縮正當化措施在 1980 年代初期開始出現裂痕（王振寰 1989：100；底線筆者所加）。³

換句話說，王氏形式上雖將「退縮正當化」界說為：1979 年鎮壓以後國民黨才必須強化與地方派系的結合，但實際上整篇文章自討論正當性問題開始，推論的邏輯以及給人的印象，卻是國民黨政權自 1972 年面對外部正當性危機以來，便以加強與地方派系和資本家結盟關係的方式來回應，且正是因為到了 1979 年時已強化了與本土政治、經濟精英的結合，具有穩固的正當性基礎，故敢於進行鎮壓。

如果問題只是出在讀者的誤讀，未能明辨由外而內的正當化與退縮正當化的細緻差別，或是王振寰自己下筆時與心中所想的有落差，從而出現不一致的現象的話，其實也不必筆者在這裡雞蛋裡挑骨頭。

3 該文的摘要同樣很容易給人這樣的印象。

畢竟，從正當性危機來分析兩次政治轉型，認為它分別引發了由外而內及由上而下的正當化，以及國民黨藉強化原支持者的認同來回應正當性危機，一般看來不會有什麼異議。筆者之所以大費周章重探這一段歷史，在於前述的混淆或理解上的差異雖細微，卻極為關鍵。例如把國民黨鎮壓《美麗島》所代表的民主運動解釋成「內部正當化」的結果，或是「退縮正當化」的原因，不但直接影響到我們對「美麗島事件」的理解，也連帶牽動到對 1970 年代以來政治發展的歷史認識，實有釐清的必要。

更重要的是，王振寰關於國民黨政權在 1970 年代藉加強與地方派系、資本家的結盟，以這樣的內部正當化手段來取代原有的外部正當化，化解正當性的危機，與後來關於地方派系的研究所發現的事實牴觸：國民黨在 1968 年嘗試性地提名三名黨工競選縣市長獲得全面成功後，1970 年代的基本政策是以黨機器取代地方派系，有意識地在選舉中提名黨工來取代地方派系的候選人，以打壓地方派系的勢力，激起地方派系在 1977 年紛紛以支持黨外的候選人來反制，導致國民黨在選戰中嚐到空前的「敗績」（陳明通 1995: 179ff.）。

對照這樣的歷史事實，就算我們弄清楚「退縮正當化」究竟該以字面上的版本，或邏輯推論上的版本為準，還是無濟於事。因為，所涉及的不再是可在一定範圍內藉修正解決的問題，而是對王氏的論證邏輯、對我們一向信以為真的「由外而內的正當化」的歷史認知構成根本的挑戰。如果國民黨在 1970 年代並未強化與地方派系的結盟關係，那麼它究竟是如何達成內部正當化的？為何後來又會出現對《美麗島》黨外民主運動的鎮壓呢？

尤其，王振寰(1996: 139-140)自己後來也注意到，國民黨 1970 年代初的「本土化」政策，除了提拔台籍「青年才俊」外，也隱含有打壓及取代地方派系的意圖，而不是如他先前認為的，只有在少數特殊情況才會出現「空降部隊」的提名方式（王振寰 1989: 94），卻全然未意識到這與他先前的說法不符，顯示問題不如想像中單純。對此，一種簡單的解釋方式是，王氏之所以未意識到此一矛盾，是因為他嚴

格地把「退縮正當化」理解為 1979 年鎮壓《美麗島》黨外勢力後才開始的緣故。⁴ 然而，筆者卻以為，根本的問題來自他所採用的詮釋架構。當他認為正當性來自其他權力擁有者的支持，那麼，國民黨在面臨外部正當性危機時，會選擇強化與內部既有權力擁有者的結盟，無疑是相當合乎邏輯與情理的推論。要確認出哪些人能被算做是內部的權力擁有者也不會太難，就如前面的引文顯示的：地方派系、資本家與軍方。在這樣的詮釋架構指引或暗示下，難怪他先是在沒有具體資料可佐證時，逕自依理論的邏輯認定國民黨必然會強化與地方派系的結盟，之後雖知道國民黨在 1970 年代並未加強與地方派系合作的事實，卻依然視而不見。

儘管王氏此文廣被引用，但迄今仍未有人正面指出此一矛盾。筆者認為，或許是欠缺替代的理論或解釋架構，才使得這個矛盾至今仍有意無意地被忽略，因此有必要重新反省他的理論架構，另覓替代的詮釋觀點。鑑於對 1970 年代初政治發展的了解，將影響到我們如何理解整個台灣政體轉型的過程，其重要性不容忽視，所以筆者願以拋磚引玉自勉，挑戰既有流行觀點，試圖重構這在許多人眼中或已成定論的歷史，希望在保留住「由外而內的正當化」這個概念舊瓶的情況下，注入既能符合經驗事實，又有理論意義的詮釋新酒。

以下，筆者將先提出自己的一套歷史圖像，再據以比較、討論筆者與王文在觀點上的異同，看看循著筆者採取的象徵的建構與鬥爭的進路，能否多看到些王文沒看到的東西、解釋王文沒解釋的問題、化解王文的矛盾。

4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林佳龍(1998: 240)身上，他雖然討論了國民黨自 1960 年代末以來取代地方派系，以迄後者於 1977 年反彈的歷史，但不覺得王振寰的敘述有瑕疵，仍直接引用他外在正當性危機促成政體內部調整的說法。在另一篇文章中，林佳龍(1999: 104)雖觸及了正當性與政權穩定關聯的問題，但繼續引用王振寰的說法，並未對王氏界定的正當性概念進行反省。

二、歷史圖像的重構

（一）國民黨政權正當化及權力之不足

如許多研究已指出的，⁵ 戰後在發生二二八事件的不幸衝突後，國民黨身為「外來的」、欠缺本地社會基礎的政權，面對著正當化其統治的困難，政治決策難以獲得一般性的、充分且自發的支持。除了土地改革、施行有限的「地方自治」，以及在二二八事件導致地方政治精英大量換血後，在選舉侍從主義的架構下建立一批與之合作的地方政治精英（地方派系）等措施（Wu 1987；吳乃德、陳明通 1996），帶來一定程度的正當化作用外，⁶ 國民黨決策的拘束力主要是建立在有形暴力的直接運用或象徵性使用，及相伴而來的嚇阻效果上。1950年代的台灣事實上便籠罩在由情治機關主導的「白色恐怖」氣氛下。但這種統治方法顯然有很大的限制，因為，暴力往往只有在當下的此時此地才能發揮作用，而較難令某人的決策變成其他人決策時的前提這種成效，在超越面對面緊接著的決策範圍時，依然有效，也就是無法充分發揮權力的作用，自然也就無法享受到運用權力所能帶來的化約複雜性的好處。對一度受過有效率、有紀律的日本官僚統治的在地台灣人來說，這種訴諸暴力、粗糙而赤裸的統治方式，很容易激起不滿與反感。

韓戰爆發後，美國恢復對台軍事和經濟援助，提供國民黨政權外部保護並解決內部財政所需，固然解救了國民黨，但並未真正地解決統治的問題。因為儘管國民黨能夠以強制為支撐，使人民一般而言會選擇準備接受它的決策，但它應付複雜性的能力卻不夠充分，因為權力關係中的雙方都只具備有限的選擇性與自由度而已。換言之，國民

5 由於對相關的社會結構及政治過程已累積許多文獻，以下的重構只凸顯本文關心的論證主軸，故有詳人所略，略人所詳的情形，但這不表示筆者主張單一因果決定論，或本文提及的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6 事實上，對當時在內戰中節節失利，政權岌岌可危的國民黨來說，最迫切的毋寧是先求生存，之後才談得到正當化其統治的問題，儘管兩者間並非全無關聯。

黨政權並未事先就對未知的情境籌措充分的共識，只具備有限的彈性與不確定性準備，沒有能力處理較複雜的情形與應付較嚴苛的外部挑戰。雖然藉著特務、準列寧黨的黨組織及國家統合主義，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實現了高度的政治控制並獲致相當的穩定性，卻只以有限的方式運用決策的權力。國民黨雖掌控相當的物質基礎，卻沒有充分利用可在此基礎上創造出來的諸多使用權力的可能性、沒有充分利用「權力」這個溝通媒介的象徵潛能，甚至還把許多議題排除在透過政治途徑來獲得共識之外——儘管它同時以人為的方式，將政治系統與其他系統耦合起來，因此導致了某種意義的高度政治化。國民黨採用的官僚及選舉侍從主義的二元架構雖有助於穩定政權(Wu 1987)，創造出一批追隨者，並帶來間接的正當化效果，同時卻也削弱了另一部分人的支持。

對始終處於共產中國威脅下的國民黨政權來說，為了能創造出具拘束力的決策、應付由環境及自身製造出來的複雜性並繼續存活下去，國民黨事實上需要更多的權力，也就是（儘管在同樣的物質基礎上）為自己及被統治者創造出更大的自由行動空間，降低權力能有效運作的條件限制。為此，國民黨必須善用人民「信任」權力的潛能，讓人民更主動地服從，更快、更好地配合實現政權企求的目的，讓暴力的使用、威脅與監視變得多餘。然而，美國因韓戰重拾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以及其後形成的冷戰結構，不但保住了國民黨作為中國合法政府的正當性，更提供了充分的外在保護。這就免除了國民黨最大的威脅，使得它光靠武力便足以確保政權的穩定，也就沒有感到提升應付複雜性能力的迫切需要。但這同時意謂著，美國對台灣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一旦美國轉而與中共親善，減弱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情況將有很大的改變。

1960 與 1970 年代，當中共與蘇聯由於意識形態差異及領土糾紛而從盟友變成敵國後，美國為了聯中（共）制俄，開始推動與中共外交關係的正常化。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自 1970 年以來，不但國民黨政權日益陷入外交孤立，中華民國體制在世界政治系統中也日益遭

到否定。更重要的是，儘管美國自與中共改善關係以來，一再表示反對中共以武力解決所謂的台灣問題，但隨著美國態度的轉變，國民黨政權長期以來憑恃的外在保護傘，也開始變得不確定起來。

當國民黨必須自行面對中共的武力威脅，而且不只是在軍事上，而是同時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與之競爭時，不得不開始正視自己應付複雜性能力不足的問題。尤其，隨著社會複雜性的日益提高，溝通相應地愈來愈必須對仍是未知的情境預做準備。以經濟發展為例，自 1960 年代中經濟起飛以來，為了能在市場上獲利，人們必須能更迅速而有彈性地調整各種資源配置的組合。相應地，人們會期待政治系統也具備更多的彈性，對國民黨黨國掌控經濟資源以及各種不利市場競爭、不利迅速回應市場上的不確性，乃至創造出不公平競爭的管制，愈來愈不滿。⁷ 要化解權力不足所造成的應付複雜性能力不足的窘境，⁸ 國民黨政權必須設法解決因為威權統治所造成的，人民對於權力象徵的信任不足，對權力使用設定了過強限制的條件化的問題，才能增加權力的流通，創造出更多可資運用的權力。

這要求統治政權將權力更加建立在共識，而非強制的基礎上。具體來說，便是需要引進民主機制，用權力來拘束有權者，令權力變成是反身性的、應用到自己的身上，好提升籌措共識的能力。當被統治者相信，統治是由他們來行使時，自然更有意願接受由他們授權的代表做出的決策具有一般性的拘束力，並以此作為自己進一步決策的前提。同時，這個轉變也有助於在選擇性傳遞⁹的過程中容許較高的不確定性與開放性，從而實質提升了統治者的權力。藉著這種具有較大

7 相對來說，在正常民主國家，人們就比較不會以「不正當的統治」來歸因，因為他們能影響誰成為統治者。即使像資本積累與正當化的兩難命題指出的，人們可能會對特定的政府感到不滿，但恐怕只有在極端的例子中，才會喪失對整個體制的「正當性」信仰。

8 權力不足在此並非專指國民黨滲透社會（如龔宜君(1998)所討論的），或調控社會複雜動態的能力不足的問題，而是在更一般的意義下，也就是要從本文後面第三節討論的，權力這個溝通媒介的「緊縮」來理解，適用於所有的權力面向。用白話來說，也就是儘管國民黨擁有十分的物質基礎，卻只能完成遠低於十分的事，無法充分發揮它在象徵面向上的潛能。

9 選擇性的傳遞指某人選擇的模式會變成其他人選擇時的前提，詳見後面第三節的討論。

彈性的權力機制以及隨時視民意調整決策的民主機制，才有可能在政治系統內建立起充分不確定的系統結構，並確保對其他的可能性維持開放性，才有能力應付較高的複雜性。¹⁰

（二）由外而內的正當化

所以，的確如王振寰指出的，1970 年代初有過一波因外部正當性危機所引發的政治轉型，而且國民黨也的確是以加強內部正當化的策略來回應，但這兩者的具體內容卻都必須重新理解。首先，不能只從喪失「外國（有權者）的認可」來理解 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進而導致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政權，成為中國合法政府代表所引發的外部正當性危機。以國民黨最重要的外部支持者美國來說，當時固然開始和中共交往，但並未立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直到 1979 年才正式與中共建交。就是到了今天，美國乃至整個世界政治體系固多不承認中華民國，從而減弱了對台灣統治當局的認可，但並沒有完全取消此一認可，除了中國以外，其他國家也沒有挑戰它實際統治台灣的積極意圖。¹¹ 事實上，是國民黨政權敗退來台後，仍一味採行「一個中國」的正當化策略，自視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始終抗拒此外的其他替代方案（如一國兩府與兩個中國），才使得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錯失了原本或可繼續獲得國際政治承認的機會（國史館編 2000: 125ff.；薛化元 1996: 236ff., 1999b: 34ff.；田欣 1996: 332ff.；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rvice 1967: 86, 201-202）。

前述的情況清楚指出，外部正當性危機牽連到的是，在日益鞏固、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世界政治遊戲規則下，國民黨政權所代表的整個體制、制度因成為難以處理的異例而遭到否定的問題（Meyer et al. 1997；Thomas et al. 1987；汪宏倫 2001）。但儘管在台灣的中華民

10 所以，儘管如王振寰、錢永祥(1995: 28ff.)指出的，光是以形式民主的選舉選出領袖，並不保證威權的消失或真正民主的實現，但從脅迫到同意的改變，不論就正當性還是權力運用來說，畢竟都出現了重要的差別。

11 即使是視台灣為自己領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還是在「認可」中華民國政府——即台灣現有統治當局——頒發的護照的基礎上，核發「台胞證」。

國的「國家位格」(statehood)遭否定，這個政權所做成的實際決策並未因此完全不為其他國家認可。否則台灣不但無法與其他國家進行經貿往來，中華民國也早該從地球上消失了。更重要的是，這個外部正當性的欠缺，是無法藉由獲得內部「有權者」的支持來解決或轉移，因為這牽涉到整個體制與思維模式的調整與更換。循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國民黨自 1972 年開放中央層次的政權參與以來，不但沒有減弱內部的反對聲音，反而促使反對勢力穩定成長以及激化統獨問題。

當 1950 年代較具批判性的《自由中國》雜誌，都未能隨著內外情勢的演變反省到，以「法統」論述支持既存體制可能造成的問題（薛化元 1996: 236ff., 1999a），國民政府遷台以來的發展，已埋下後來民主化、族群政治、國家認同爭議，以及如何能使以台灣為範圍的政治實體在世界政治體系中獲得承認，這許多複雜的問題彼此糾結難解的局面。因為，在國民黨將「法統」與「一個中國」的論述掛鉤，並以此為其政權正當性的基礎，而未隨著國際情勢演變調整一個中國架構下相關政治制度設計的情況下，日後以國會全面改選為核心的民主化要求，勢必同時挑戰一個中國的主張與中華民國體制的正當性。同時，在外省人雖是少數卻佔政治優勢，而國民黨一開始不但未藉施行民主來化解省籍間的分歧，反而有意無意地維持省籍界限，並刻意貶抑本省人的情況下，居於多數的本省人後來會在民主化過程中進行族群動員，從而加劇國家認同的衝突，不足為怪。¹²

其次，國民黨不是像王振寰說的那樣，藉加強與地方派系的結盟來強化對內正當化。¹³ 相反地，國民黨推動革新以加強內部正當化的

12 從這個角度來看，王振寰、錢永祥(1995)把日後的發展定性為民粹威權主義，但只談內部的權力競爭，而不處理外部正當性的問題，恐有失之片面之虞。另見張茂桂(1993: 9-10)對「本土化」問題的討論。

13 筆者對國民黨當時是否曾加強與資本家的結盟關係有些懷疑，但因未研究過，不敢逕行斷言。如果不把中小企業主只看成中產階級，而是也視為資本家的話，那麼其中不少人在 1970 年代初是支持改革的。王振寰說台灣當時的資本家只想賺錢，不過問政治，這或許是事實，但不表示他們不想或沒興趣參與政治，而更可能是因為有高度風險，所以才不敢涉入。他們未必想繼續當「兒子」，而不想變成政權的夥伴或甚至自己當主人。他們未必沒有不滿，只是不敢造反，而且在利害考量下，多半會選擇與國民黨結合，因為當時尚未有替代可能性出現。資本家對執政黨與反對黨雙面下注，後來便是常見的現象。

手段之一，便是在選舉時提名形象清新的黨工，取代人民眼中貪腐的地方派系成員。除此之外，國民黨的「本土化」政策，包括擴大召募本省籍黨員，使其比例超過一半，提拔本省人出任重要的黨職幹部或政府官員，改善以往台籍與外省籍人士政治上極度不平等的現象，也都有一定的正當化作用。但最重要的，仍是自 1972 年起，定期舉辦「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開放中央層次的政治參與機會。¹⁴ 就如以「青年才俊」取代地方派系所明示的，這些作為不是要拉攏內部特定的有權者，反而是直接訴諸一般的被統治者，想藉此讓他們相信國民黨的統治是正當的，而不只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¹⁵ 的確，如王振寰所主張的，這樣的改革並不符合政體轉型模型所稱的「自由化」，遑論「民主化」階段，但畢竟引入了一些民主的成份。而就如許多政體轉型研究顯示的，自由化與民主化未必一起到來，也沒有一定的先後次序。¹⁶

不論這個開放政權的做法多麼有限，畢竟對國民黨的統治起了相當的正當化作用，¹⁷ 同時也增加了可資運用的權力，提高了整個政治系統化約複雜性的能力，舒緩了以往權力不足的問題。然而，就如系統理論的一般命題所指出的，在國民黨政權提升自己解決複雜性能力的同時，卻也升高了政治系統的複雜性。儘管只開放了有限的增額中央民代選舉，卻不但使得政治系統的自我觀察變得更複雜，¹⁸ 使得不

14 1969 年曾因老代表自然凋零的緣故，舉辦過「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補選」，共選出 28 名如「法統」代表一般不必改選的代表（鄭牧心 1987: 122-123）。這雖也算是開放中央政治參與的機會，但意義與影響和 1972 年起的定期選舉自不可同日而語。以顯而易見的數量來說，1972 年便選出了 119 名代表，且此後不斷增加。

15 我們恐怕很難把這些「青年才俊」視為「有權者」，所以儘管這可以看做國民黨強化與內部政治精英的結合，但終究稱不上是爭取「內部有權者的認可」。

16 1990 年前後東歐、蘇聯的變局，是自由化未必先於民主化的顯例。這一波轉型的特殊性還引發了，究竟是以威權到民主的政體轉型，還是「後共產主義」的概念來描述比較適合的辯論(Bunce 1995a, 1995b; Karl and Schmitter 1995)。

17 這反映在後述蔣經國得以贏得大有為政府的名聲，以及他推動的改革幅度超乎一般預期的現象上。

18 觀察指藉助一組區分來指稱某東西或藉此獲得訊息（湯志傑 2004a: 131-132），政治系統（或社會）的自我觀察指政治系統（或社會）對自己的運作，特別是對作為整體的自己進行觀察，例如以自由中國／共產中國、中國／台灣、民主／威權、常態／緊急狀態…等區分來觀察自己。

同於執政者的聲音得以進入大眾媒體，進入社會自我觀察機制之中，而且反對人士也開始得以突破個人化的經營與地方性的局限，慢慢邁向全國性結盟，進而籌組正式政治組織的階段，成為影響接下來政治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湯志傑 2006）。所以，不論是要解釋反對運動的興起，¹⁹ 或是政體轉型，²⁰ 嚴格說來都不能只從 1975 年算起，而勢必要回溯到 1970 年以來的政治轉型。因為，是這一波轉型所帶來的新的結構可能性，才促成全國性反對陣營的形成，以及使接下來的政體轉型成為可能。²¹

在流行的政體轉型模型的影響下，國內的相關討論多習於以重新界定及擴大權利範圍的自由化為轉型開始的指標(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7)，視 1986 年民進黨的成立（及緊跟著的 1987 年的解嚴）為政體轉型的開啟，並相應地將焦點放在這之後的發展上。然而，這種按表操課的套用很容易把我們的注意力從實際的歷史過程轉移開來，以致忽略了其中的偶連性(contingency)，²² 以及不同地區發展的特殊性。其實，政體轉型模型最初是希望引進不確定性的觀點(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Chap. 1)，並因此帶來不少洞見。然而，它預設的開啟(opening)、突破(breakthrough)、鞏固的階段順序，不但難以符合所有的轉型經驗，更會誤導研究者及行動者。²³ 在台灣，是

19 現有討論多只片面凸顯《大學》與《台灣政論》人脈上的關連（杭之 1990；南方朔 1994 [1979]），而沒有注意到《大學》促成的制度改革是全國性反對運動得以興起的重要結構可能性條件。相應地，這些討論多半採取較嚴格的觀點，把黨外運動的興起斷代於 1975 年，彷彿它是憑空產生，不需解釋似的。古淑芳(1999)雖注意到黨外運動形成的背景，卻採更嚴格的「彼此串聯」的判準，認為黨外運動一直要到 1977 年才告形成。

20 Cheng (1989: 484)雖提到 1970 年代初的改革，但認為國民黨的回應是政治收編及少量的、容許異議的政治自由化（而不是著重民主化的成份，即開放中央層次的選舉），因此不認為這是轉型的開始。

21 當然，這是事後聰明的解釋。如果不是事後的發展證實這一點，那麼它就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

22 偶連性指的是排除必然與絕不可能兩個極端後的廣大可能性範圍，也就是現實上或歷史上一度可能，但未獲實現的替代選項。依此觀念，社會運作與運作之間的銜接總充滿或多或少的不確定性，唯有同時掌握到現實性及相伴的可能性界域，以及兩者相互影響下的辯證演變，才真正掌握到完整的現實或歷史（湯志傑 2004b）。

23 對直接涉及資源分配的政策單位來說，這是個現實上迫切的問題。也因此，已經有人喊出必須「終結」政體轉型的典範(Carothers 2002)。其中，台灣還被引做漸進演化的反證，例如民主突破後並未立刻伴隨全國性的選舉及新的民主制度架構，相反地，是在反對黨持續不斷的努力下，最終才於選舉中獲勝。這同時凸顯了，政體轉型典範追

反對黨先搶灘成功，才跟著有解嚴的歷史事實，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把這視為自由化，視為政體轉型的起點是否適當。毋寧要回溯到 1970 年代初的政治轉型，我們才能解釋反對運動的興起，以及接下來反對黨的成立。這波的轉型雖不符合政體轉型模型界定的自由化與民主化，但不只在過程中將原有名義上有制度保障的言論自由等權利實現為真實的權利，²⁴ 而且也促成了開放中央層次選舉的「民主」結果。是這些自由、民主的成份為接下來的發展創造了可能性的條件。

（三）轉型的產生：結構可能性條件與歷史偶連性的匯聚

然而，究竟應如何解釋 1970 年代初的政治轉型？「由外而內的正當化」是否足以解釋一切？王振寰(1993: 131ff.)曾引述 Goran Therborn (1977)的看法，認為必須有下層大眾的動員，才會出現使威權政治改變的政治轉型；但 1970 年代這波轉型並未出現明顯的大眾動員，那麼動力從何而來？如前面的分析指出的，外部正當性危機固然是引發此次政治轉型的重要因素，但畢竟只是催化劑，雖參與其中，並加速了反應，但本身並未改變，依然持續存在著。筆者認為，要解釋此一發展，除了得回頭看國民黨與呼籲改革者，各自如何建構、界定現實的問題，展開關於正當性的象徵鬥爭外，也必須注意公共領域的促成角色。²⁵ 另外，還有研究者在討論下一波政治轉型時多會注意到，但在觀察此次轉型時卻常視而不見的關鍵：威權統治者權力繼承的問題。²⁶

隨者因應個案的現實，往往也不遵守原有的概念界定（這恐怕是不少混淆的來源），像 Cheng (1989)便把反對黨的成立稱做突破，但在一般架構中，這卻是跟威權政體的崩潰相連結的。

- 24 威權政體並非極權統治，而是「有限的多元主義」(Linz 1975)，所以是否能明白辨認出「自由化」的作為或階段，恐怕常是很模糊的。
- 25 本文所謂的公共領域，並非採用 Habermas 的概念，而是指任何一定程度公開的公共社會空間，在其中的溝通可被其他觀察觀察到，從而具有二階觀察的動態，得以扮演社會內環境角色者（湯志傑 2004a）。
- 26 雖然南方朔(1994[1979])非學院的論述，或是親身經歷這段歷史的黃默(Huang 1976)，都曾指出權力繼承的問題。但在政體轉型模型流行起來後，一來這次是「平順的」(smooth)權力繼承，沒有引發「危機」，二來這波轉型不符合政體轉型模型關於轉型開啟(opening)的界定，本就少受注意，所以後來討論政體轉型的文獻，多半忽視權力繼承

國民黨政權雖然在台灣實施威權統治，但畢竟不是極權統治，仍容許有限的多元主義。國民黨雖然有很強的「控制」社會的企圖，但主要目的在抑制或解消人民積極的政治參與，而沒有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組織，令所有組織臣服於它的政治綱領之下，以黨組織取代所有功能系統的想法。國民黨不但容許私有財產與民營企業的存在，基本上也沒有對後者施以嚴格控制。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中共的競爭，也都使得它的威權統治蘊含有較多民主化的可能性（林佳龍 1999: 91ff.）。例如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雖遭限制，但畢竟還有一定的出版空間，以及具競爭性、還算公平的地方選舉，從而容許了一個儘管遭到多方箝制，但並未完全消失的公共領域。早在 1950 年代，隨著台灣外部安全獲得確保，原本替國民政府宣揚反共理念的《自由中國》，轉而向內批判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並主要集中在言論自由、黨化教育與反對黨等問題上，要求回歸民主憲政，維持國家中立，尚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國民黨政權用以正當化其威權統治的「法統」論述。²⁷ 在《自由中國》因組黨而遭鎮壓後，政治反對運動在 1960 年代出現了真空。忙於在地方選舉中獲得連任的本省反對人士既沒有力氣關心全國性的政策，也沒有膽量進行組織，挑戰國民黨政權（艾琳達 1998: 103ff.；郭正亮 1988: 117ff.）。儘管如此，定期舉辦的

承在這波轉型中的作用。像王振寰(1989)逕自鋪陳蔣經國上台後的正當化措施，郭敦仁(Cheng 1989: 485)雖注意到改革與權力繼承同時發生，但只是要凸顯蔣經國個人「推動改革」的角色，而不是注意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鬥爭促成改革、轉型的契機。後述的觀點事實上卻是政體轉型模型的標準觀點之一(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19)。同樣地，朱雲漢(Chu 1992: 25, 34)和田弘茂(Tien 1989: 74, 119)兩本討論台灣民主的專書，都沒有探討這個問題。朱氏只提及 1980 年代末蔣經國健康不佳引發的問題，卻未著墨於他 1970 年代初接班時的問題。田氏則說 1950 年代初國民黨黨改造後，蔣經國即已準備接位；在陳誠過世後，更是唯一的人選。只有若林正丈(1994: 176ff.)明白將外部危機的到來與蔣經國的權力繼承關連起來。不過，他雖提到《大學》，但並未深究《大學》與蔣經國的關係，而是跟鄭敦仁類似，把改革歸功於蔣經國上任後的作為。

- 27 例如《自由中國》雖勇敢地批評總統三連任是違憲又失民心的做法，但只把焦點放在此舉不符 1947 年憲法的修憲程序規定上，認為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中央民意代表名額不足以修憲或修改臨時條款，因此是違憲的。它雖然反對以「情勢變遷」的理由對國代總額從寬解釋，卻沒想過質疑基於同一理由而不必改選的中央民代繼續行使職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事實上，《自由中國》不但承認臨時條款就實質意義來說是憲法的一部份，而且同樣支持以「法統」來維繫中華民國體制的正當性，認為 1947 年的憲法是反共的有力號召（薛化元 1996: 300ff.）。

地方選舉畢竟形塑出一定的政治公共領域，也使得政治的反對傳統不致完全斷絕。另一方面，外省知識份子則轉進到所謂「思想的」和「文化的」討論，例如像《文星》雜誌，以不直接觸及現實政治的方式來尋找替代的出路，雖然終不免於 1965 年遭到停刊，但多少使得政治的公共領域不至死寂一片，保留下異議的火種。

前述的公開表達異議，對現實政治固然只有很小的影響，其貢獻卻不容輕忽。因為唯有如此，反對勢力才能在不利的情况下繼續存活，雖然他們散佈在各地且力量十分微弱。以 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79, 1994)著名的「沉默的螺旋」命題來說，²⁸ 如果反對勢力沒有任何公開的發聲管道，以致立場根本無法在媒體中呈現的話，那麼反對勢力在公共領域中也將變得瘖啞無聲，乃至瓦解。在大眾媒體作為社會自我觀察的主要代理，持續地建構及規制公共記憶的情况下(Luhmann 1996)，沒有聲音幾乎就等同於不存在。就是所謂的「死硬派」，若長期處於孤立，為敵視的眼光所包圍，最終常也不得不屈服，或最多只能以溝通記憶的形式來傳遞反對意識。²⁹ 因此，對持反對立場的讀者來說，證實「同志」存在此一潛在的溝通面向，常比訊息的閱讀本身來得重要。

不過，外交的挫敗以及台灣日益險峻的國際處境，終於打破了社會長期以來的沈寂。1968 年 1 月創刊的《大學》雜誌，原本追隨《文星》的模式，迴避討論現實政治問題，自此也開始關心起現實的政治局勢。1970 年 8 月發生釣魚台主權爭議，同年 12 月起，留美台灣學生開始發起保釣運動。到了 1971 年 4 月，學生運動的風潮也在台灣出現。此一自發性的愛國群眾運動，固然在國民黨政權的威權控制機

28 這個說法跟「西瓜偎大邊」、「拼人氣」的日常智慧其實相去不遠，亦即所謂的意見氣候是由說話與沉默決定的。換句話說，發聲是有作用的。如果人們清楚知道自已的意見與週遭的多數人相左，公開表達會令自己陷於孤立的話，將傾向選擇沉默。同時，不發聲的選擇又會導致自己的意見在公共領域中的代表性變得更低的惡性循環，也就是日趨沉默的螺旋發展。

29 「二二八事件」及 1950 年代「白色恐怖」的禁忌化是很好的例子。除了受害者的親友等有限的圈子外，到 1980 年代之前，這些在公共討論中一直遭到消音，有如完全被遺忘一樣(Meyer 1996)。關於溝通記憶的概念，見湯志傑(2004b: 103)。

制上打開一個缺口，但還沒有引發任何政權動搖的危險。對國民黨政權來說，美國政府於同月發布「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未定」的新看法，才是更嚴重的打擊。國民黨政權在聯合國中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因此陷於危險。到了 7 月，美國進一步宣布，美國總統將訪問中國大陸。同年 10 月，國民政府便主動退出聯合國。此一直接影響到台灣安全的國際政治變化，導致政治改革的要求迅速提高。就在同一個月，《大學》雜誌不但發表〈國是鉅言〉，提出諸多改革建議，社長陳少廷更撰文明白主張國會全面改選。到了 12 月，台北的學生團體也發表一個正式聲明，要求加強外交及內政改革（Huang 1976；南方朔 1994[1979]）。至此，國民黨政權顯然必須為自己政治決策的拘束力創造一個新基礎，才不致陷入權力日益緊縮，乃至只能訴諸暴力的死胡同。

雖然在此之前，公共領域中不曾出現過對國民黨正當性論述的根本質疑，但它賴以憑藉的法統論述卻是很容易被解構的，³⁰ 因為這些論述所指向的意向(intention)和描述之間本身就不相符。³¹ 當國民黨以 1947 年頒佈的中華民國憲法為政治正統，宣稱自己是據此憲法行使統治的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且是為了維持「法統」、維持全中國的代表性，才必須讓先前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繼續行使職權至光復大陸舉辦新選舉為止，作為它的正當性論述時，便留下了下述的解構可能性。

首先，1947 年憲法的主權聲稱範圍與國民政府實際上控制的疆域間，有著巨大落差。「反共勘亂」的緊急狀態理由固可一時遮掩住此一執行(performative)與陳述(constative)面向間的矛盾，但在中華人民

30 早在 1960 年代，殷海光便批評過蔣介石只是把反攻大陸當「政治神話」利用，是利用「大陸人對中共的恐懼和重返家園的憧憬」將自己變成台灣的神（田欣 1996: 337-338）。換句話說，雖然擁護自由主義的外省籍知識份子並未直接挑戰中華民國體制的正當性，卻也已指出，國民黨政權只是利用緊急狀態的理由，以及由此衍生出種種似是而非、不合民主憲政常理的說法，來合理化其威權統治。

31 關於援引 Austin (1997) 的執行／陳述(performative/constative)這組區分來談具拘束力的決策在意向（告知）與描述（訊息）間往往相矛盾，因而可被解構的情形，見 Luhmann (1995: 105ff.)。

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世界政治系統中被承認的唯一中國後，跟「一個中國」論述掛鉤的「法統」論述，光就陳述面向來看也愈來愈站不住腳。而且，當台海對峙的情形長期穩定後，日益凸顯大陸格局的憲法不但不符現實的需求，更在小海島上造成疊床架屋的紊亂。³²被當做系統記憶堅持的憲法已僵化到和現實脫節，很難憑其起源便理所當然具有拘束力。尤其，這個落差又與省籍政治不平等的問題相夾雜，其正當性更容易被質疑。³³

其次，1947年的憲法口頭上雖被奉為正統，但實際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才具有優位性。雖然這在當時普遍被視為具有正當性，是特定時空環境下為了不破壞憲法完整性而不得不然的暫時安排，但依當代憲政原理來說，此一不變動憲法法典的憲法修改，實已造成形式意義上的憲法破棄（許宗力 1992: 405-406）。至少，當臨時條款實際上並未依其明列的授權規定於 1950 年 12 月 25 日喪失效力，而是直到 1954 年才由國民大會的一般常會（而非原規定的特別會議）予以事後追認時，其違憲的事實已不辯自明。儘管國民黨政權用大法官會議的解釋來補強它的正當性，但這對後世熟知西方憲政原理的知識份子來說是不具說服力的。尤其，臨時條款其後又由本身合法性都成疑問的「法統」代表一再地修正，不但違背原憲法內閣制的精神，不斷擴大總統的權限，賦予的更是不受制衡、不符民主憲政責任原則的權力。無怪後來的憲法學者要稱此一形式上雖附在憲法之後，實質上卻是超乎其上、令其根本失效的「臨時條款」是違章建築了。當戰爭威脅日遠，承平日久，反攻大陸卻遙遙無期時，這種臨時體制的永恆化，愈來愈難自圓其說。³⁴

32 陳少廷在 1972 年初，國民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後，即對傳聞中將調整政府組織，改採二實二虛的制度設計，將省和鄉鎮虛級化的構想表示贊同（大學雜誌 49: 99）。在臨時條款修訂後，《大學》更正式在社論表示：「多年來，政府行政機構的疊床架屋、事權混淆、及效率不彰，早已為人所詬病了」（大學雜誌 51, 52: 11）。

33 但在《大學》的階段，異議者雖強調機會不均等是造成地域歧見的根源，但仍只歸因於關係、背景作祟，尚未公開質疑制度的正當性。毋寧是到《台灣政論》，才開始針對制度造成的省籍不平等現象進行批評。

34 前述兩點質疑，可見於 1971 年 11 月 22 日出刊的台大《大學新聞》社論的主張：「非常時期……已經是一大不幸，因此任何人便不能老是賴在這個不幸的困難上，硬打出政

最後，先前選出的中央民代因等同「法統」而不用改選，這套論述不論在合法性與正當性上都有無可彌補的破綻。以合法性而言，於1951年5月任期屆滿的立委是以行政院呈請總統咨商立法院，委請其暫時繼續行使職權一年，經立法院贊同延長自己任期的方式為之。以這樣的程序來正當化其延任，不但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而且明顯違背利益迴避的法治原理。當連續以這樣的方式延長三年，直到監察委員任期亦屆滿時，行政院才一方面沿用原方式，另一方面函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至於國民大會代表任期的延長，則更是在大法官會議做出立、監委得繼續行使職權的解釋後，直接以行政院院會決議，提報總統核可而已，連釋憲的程序都省了（鄭牧心 1987: 116-117）。儘管在形式上，「法統」代表無限期延任有大法官會議解釋的背書，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不符合民主憲政最粗淺的定期改選原則。以「情勢變遷」或「緊急狀態」為理由，或可讓人民接受一時，但若人民長期沒有自己的代表，無法直接或間接決定國家元首，無法實際影響政府決策，很難說服他們接受整個制度是民主且正當的。以「法統」為理由限制人民參政的權利，只是更易於讓人們將「法統」視為行使威權統治的藉口，對居人口多數、但在政治上卻處於絕對劣勢的本省人，以及受過現代高等教育、又有一定經濟能力的中產階級來說，更是如此。³⁵

治藉口與招牌做掩飾，而輕慢一切正軌的合理推行。非常時期的根本之道，乃應更不遺餘力地具體實踐憲政的建國之道…尤有甚者，逞豪強張門面的組織與制度，均不合我們目前應該節衣縮食的創新局面。這些疊層架屋的組織與制度，在基本上只是削弱國勢，徒增包袱的不合宜措施」（洪三雄 1993: 168）。另外，1972年3月6日起，程放刊於《台大法言》的〈政治革新的精義〉、〈建國優先論〉及〈民主至上說〉三篇文章，對既有正當性論述的各種說法亦進行了解構（洪三雄 1993: 208ff.）。

- 35 陳少廷在主張全面改選時即說，「中央民意代表最令人詬病的一點是，他們業已失去『代表性』」；「當前政治結構的基本問題乃是新陳代謝問題…必須把新生的經濟社會的力量投射到政治權力結構的層面來。於此，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問題，乃成為全面政治革新問題中最首要，而且也是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我們歷年舉辦全國少年棒球選拔賽，中央研究院新院士選舉，也都只限於自由地區，而從沒有人懷疑他們是否可以充份代表我中華民國」（大學雜誌 46: 13-14）；以及全面改選才是消除本省人和外省人歧見，去除「中央是外省人的，地方是本省人的」錯覺以及解消「當兵有份，納稅有份，參政無份」的民怨的良方（大學雜誌 49: 83-84）。另外，許志仁也質疑，「若謂中華『法統』繫乎此批人身上，則我們要問，是否這批年近七十的民意代表去世後，中華法統也就隨之斷絕？又如何能解釋何以這批人能代表中華法統，

尤其，自由與民主一直是國民黨政權自我標榜，用以和共產極權區隔的標籤，因此很難迴避人民的民主要求。當人們從小自被奉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中學到，民主政治繫於「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選舉，但卻只能投票選舉地方首長與民代，而無從與聞中央層次的選舉，毋寧會覺得這是奇怪、不合道理的事。³⁶也難怪《大學》公開抨擊「法統」代表，要求國會全面改選前，這個議題從未在輿論上獲得討論，卻能一經提出便獲得熱烈迴響，造成當期雜誌重印五次的熱賣現象（Berman 1992: 181；江宜樺 2001: 296）。

因此，1972 年的政治轉型，雖然沒有明顯的大眾動員，但從保釣的學生運動開始，到公共領域中的異議獲得廣泛支持，對正處於喪失外部正當性、內部正當化又一向不足的國民黨來說，委實是不可忽視的壓力。³⁷

然而，若非適逢國民黨政權內部的權力繼承及相伴的權力鬥爭過程，光是前述歷史偶連條件的匯聚，恐怕仍無法促成它開放少部份的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來回應。從權力而不是從正當性的問題切入，我們更容易看到威權統治本身內含的不穩定性與轉型的可能性。由於威權統治採取高度集權的統治方式，領袖佔據著牽動全局的關鍵性位置，但其繼承卻多半缺乏明確的規則，因此領袖的繼承常伴隨著權力鬥爭，不但必然帶來不小的變動，甚至有可能引發不穩定，乃至造成危機，跟所謂酋邦(chiefdom)的情形頗為類似(Wimmer 1996: 207ff., 222)。同時，威權統治往往有很強的人際取向，常發展出侍從主義的支配結構，促成派系林立，使得權力繼承鬥爭的可能性、激烈程度及影響範圍都大為提高。更重要的是，這種統治精英的內部鬥爭有可能

而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新選出來的代表就不能代表中華法統？蓋法統乃政制存續之問題，並非何人所得代表者」（大學雜誌 50: 16）。

36 陳鼓應便說，人們「除了偶而到鎮公所投一次票之外，再沒有任何的機會參與自己國家社會的公共事務。而這種選舉權又少得可憐，滑稽得可笑——凡是立監委及國大代表等重要民選，他都沒有選舉機會」（大學雜誌 37: 6-7）。

37 尤其，雖然士人主導的社會結構實際上已不存在，但當時社會上多仍維持著給予受過高等教育者較高評價與地位的傳統。因此當他們以集體的方式要求改革時，對國民黨威權政權來說仍是不小的壓力。

未預期地創造出結構變遷的機緣來。當其中部份的統治精英援引外部的力量（包括反對勢力在內）作為奧援或威脅時，尤其如此。

1972 年的政治轉型正出現前述這種情形。國民黨「強人領袖」位置的繼承，幾乎與國府在國際政治中遭致失敗的過程平行展開。1969 年 6 月，就在釣魚台事件前不久，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雖然蔣介石多少已為蔣經國鋪好接班之路，但蔣經國畢竟需要創造出一個新的、自己的「權力基礎」。這既是「本土化」政策的背景之一，也是蔣經國默許《大學》集團倡論國政的緣由之一（若林正丈 1994: 176ff.）。早在《大學》雜誌成立前，蔣經國便已透過「救國團」與年輕知識份子有所接觸，並曾多次公開鼓勵青年人應常發表自己的意見。釣魚台事件爆發後，他刻意與《大學》的成員維持良好的互動，並在 1971 到 1973 年間多次與學生、年輕知識份子和工商業代表會談。在學生運動還沒在台灣出現前，《大學》已在蔣暗示性的鼓勵下於 1971 年 1 月改組，以涵括更多的成員。同時，《大學》本身也調整成一個組織更為嚴密的團體，有別於之前的《自由中國》——儘管它一樣沒有結合民眾的企圖。毋寧是在蔣經國默許支持的基礎上，《大學》才敢於提出批判性的建議，並倡議各式各樣的改革。表面上這些言論使得整個政府都遭到壓力，實際上卻幫助蔣對抗保守的老一代，進行權力繼承，也成功地塑造出必須建立新的領導、以滿足年輕世代改革願望的呼聲。「革新保台」很快就成為深入人心的想法（南方朔 1994[1979]；彭懷恩 1989: 76-77；口述史一³⁸: Chap. 3）。

然而，為何是「革新保台」？³⁹這裡，尚需深化對由外而內的正當化的理解。「本土化」政策為何會成為國民黨採取的對策，為何能化解這次的危機，乃至將要求改革的力量引向支持政府的方向，固然有研究者一再提及的外來政權的結構性因素在，但無疑也與外部正當

38 為免冗長，本文對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所編三冊關於「美麗島事件」的口述歷史的引用，皆以口述史（一～三）的格式表之。

39 要從本文主張的象徵鬥爭的角度對「革新保台」論述勝出的過程提出具說服力的分析，將遠超出本文容許的篇幅，只能留待筆者撰寫中的《「改寫」歷史：重探台灣戰後政治轉型的起點》來兌現，此處只能稍稍彰顯它充做統一各方立場的黏合劑的角色。

性危機、人們對現實問題的界定，以及保釣以來關懷現實的「本土」論述有關。⁴⁰「革新保台」之所以能成為國民黨政權與呼籲改革者共同接受的理念，正在於改革意謂著走出反攻大陸與法統的政治神話，正視當下的現實，在承認台灣才是當下的本土、現實上的中國的基礎上力求改革，才能真正保有這僅存的「自由中國」，同時維繫住政權。在中國民族主義結合關懷本土現實的大潮流下，人們可以各取所需地把現實或本土理解成中國架構下的台灣，或只指台灣而不及於中國，並共同在保護台灣這個前提下團結起來。如此一來，國民黨雖然沒有真的解決外部的正當性問題，卻能讓被統治者相信現在是凝聚內部力量，一致對外的時候，成功地加強內部的正當性。

不過，蔣經國固然能在背後巧妙地運用《大學》雜誌的力量，壓迫老一輩保守勢力交出權力，但知識份子終究有自己的自主性，即使是蔣也無法完全控制這個一部份是自發、一部份由他促成的知識份子團體的發展。一方面，外交上的危機不只引發了對政治的關心，而且還導致對內政的分析及批評，以及潛藏的異議與不滿的公開化。自1971年7月起，《大學》開始刊登著名的〈台灣社會力分析〉系列文章，觸及許多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尤其是省籍不平等及階級差異的問題。此外，1971年底，學生發起以照顧各種弱勢者為目的的「社會服務運動」，鄉村的窮苦經驗卻升高了他們對政府的不滿，當他們的報導還需經過嚴格的審查才准刊登時，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大學》的一些成員甚至試圖領導學生運動或至少與後者建立結盟。實際上，《大學》在1972年第二次重組時，便將學生納為成員。此一發展正觸犯了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禁忌，因為，有別於以往由上而下的動員，這一波的學生運動是學生自發性的政治活動。對國民黨政權來說，這已是個警訊及憂慮，尤其是在試著透過「救國團」介入，卻無法完全控制之後。

在此一背景下，蔣經國在1972年5月成功坐上行政院長的位子

40 至於中／西、傳統／現代另外這兩組相關的區分，無法在此探討。

後，必須回過頭來替國民黨政權除去知識份子團體的威脅，事實上這不難做到。一方面《大學》只是提出建言或批評，並沒有尋求其他社會階層和團體的支持；同樣地，學生的「社會服務運動」只是個調查，而非結盟的嘗試。另一方面，蔣立刻推行改革，即前面提及的定期舉辦國會議員的增補選、提拔青年才俊及本省人，以及推動十大建設。藉此，他贏得大有為政府及果決能斷的聲譽，輕易便收割了知識份子及學生努力的成果，瓦解運動的動力。雖然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改革極為有限，還達不到政體轉型模型界定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階段，但蔣迅速的改革步調已出乎要求改革的知識份子團體的意料，以致短時間內不知如何回應。⁴¹ 尤其，蔣還運用了收編、警告、分化等細緻的策略，沒多久就使得一開始便由不同背景的成員組成、內部不無矛盾的《大學》分裂、瓦解了。

儘管蔣經國成功地將外部危機轉化成鞏固新的領導中心的動力，不但藉著推動改革化解政權危機，同時也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基礎，收編不少先前提出建言或批評的知識份子，奠定他清明且有能力的領袖形象，但隨著開放中央層次的選舉以及較為寬廣自由的言論空間，台灣的政治發展也步入了一個不可逆的新階段。蔣在繼位後固然成功瓦解了之前充做改革先鋒的知識份子與學生團體，⁴² 但反過來，政治參與和言論的空間一旦釋出後，卻也無法輕易地收回或緊縮，完全退回到先前的狀態。尤其，雖然國民黨政權仍牢牢地控制著社會各領域，但改革以及擴大了的參與空間卻也促成了人民要求改革的期望不斷上升。這不但助長了反對勢力的興起，也促使反對勢力日益走向與威權統治者碰撞的方向。尤其，以施惠的方式提拔少數的台籍人士，以及開放相對於代表「法統」的資深民代來說名額微不足道的中央民代選

41 如王振寰所說的，由於沒有反對運動的挑戰，國民黨在 1972 年的政治轉型中有更大的主導性。

42 1972 年 4 月，即蔣接任行政院長前一個月，《中央日報》率先刊登了轟動一時的〈一位小市民的心聲〉，展開言論上的圍剿，據陳鼓應的說法，這是為蔣介石連任總統做肅清的動作（口述史一：94-95）。後來則連象徵的鬥爭都省了，1973 年 2 月，警總直接約談陳鼓應、王曉波以及當時為學生的錢永祥和盧正邦，接著則有台大哲學系事件。

舉，既未解決民主的問題，亦未解決省籍政治不平等的問題，更無助於解決中華民國體制的正當性在世界政治系統中遭否定的問題。因此，茁壯中的反對運動不但要求進一步的民主化，慢慢也開始在內部質疑中華民國體制的正當性，不但就政治支持進行族群動員，而且也日益往台灣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在反對勢力於 1979 年「美麗島事件」遭受鎮壓後尤其如此。⁴³

認為 1972 年的政治轉型某個程度上促成了不可逆的發展，並不意謂著不會有倒退的情形。只是，如王振寰一般把美麗島的鎮壓簡單地詮釋成倒退是否適切，恐怕還需斟酌。如本文開始即指出的，「退縮正當化」的說法是有疑問的。但前面的分析也顯示，國民黨政權雖然不是藉由強化與地方派系和資本家結盟的方式，但的確成功加強了內部的正當性。那我們豈不是仍然可以說，因為國民黨已強化了統治

43 自保釣運動以來，學生間及反對運動中實已隱伏有「中國本位」與「台灣本位」（乃至「統獨」）取向的差異。這不但反映在《大學》之後黨外雜誌分化的系譜上，而且康寧祥的崛起，乃至穩居當時黨外領導的位置，跟他最早主張台灣意識有相當的關聯。1973 年底，張俊宏參選台北市議員時，便已散發所謂的「台獨」傳單，提倡不接受中共統治之「政治主權式的台獨」。1978 年底，因應中美建交及停止選舉的變局，黨外人士在〈國是聲明〉中也以自決為共同主張。反過來，國民黨在展開與黨外人士的象徵鬥爭，以及正當化對《美麗島》民主運動的鎮壓時，慣用的三合一敵人的說法也是：所謂的民主人士即台獨份子，而台獨份子就是共產黨或共黨同路人（張俊宏 1977: 125-126；鄭鴻生 2001；口述史一：73-74, 84, 95-96, 157ff., 192；口述史二：Chap. 17, 339）。就此而言，蕭阿勤(2003)正確地指出，不能只從工具論的觀點，把 1970 年代黨外的敘事與強調台灣鄉土的歷史建構，只看成威權統治下自保的說詞與行動的策略，認為晚出的台灣民族主義敘事或認同才反映其「真實的」認知與情感，卻不無矯枉過正之嫌。首先，當時人們理解的民族跟日後經主觀論和建構論觀念影響後所說的民族，在意涵上已有相當的差別。其次，台獨與台灣民族主義雖常有極高重疊，但兩者終究並非同一。像前述張俊宏的台獨訴求便側重在政治，尤其是主權獨立的面向，迴避民族與文化認同的問題，並未明白要求政治社群與文化社群的界限合一，雖然台獨往往隱涵這樣的要求，而且它的實踐也會帶來這樣的結果。最後，必須注意到這些論述所處的脈絡、它們的對立面是什麼、雙方主要的差異何在。黨外當時固仍多在中國的架構下論述，但也明白凸顯出國民黨向來刻意壓抑的台灣象徵，這除了自保之外，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及更重要的，爭取一般人的支持。在一般人尚習於血統論的民族觀，且黨外人士還沒完全站穩陣腳之前，他們最多恐怕只會公開主張台獨，因這尚可從國際現實來立論，而很難想像他們會搬台灣民族主義來砸自己的腳——除非參與管道被封鎖或是現況令他們覺得別無出路而逼得他們激進化。只是，如王甫昌(1996: 155ff.)指出的，在「美麗島事件」之前，反對運動主張的基調仍在於民主化，在提及省籍不平等的問題時，主要亦是從民主、從「利益團體式的政治」立論，亦即認為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造成不同族群間公民權利或機會不均等，而不是訴諸民族主義式的情感動員。不過，須注意的是，《美麗島》的言論相當程度上受到當時主編陳忠信的偏好所影響，未必完全反映當時黨外人士的態度（口述史二：311-312）。

的正當性，所以敢於鎮壓美麗島？筆者不完全否認這樣的可能性，但認為這樣的說法太過於線性，因為如果我們回到具體的歷史過程來看，會發現國民黨並非毫無遲疑。藉前一階段的改革獲得強化的正當性，至多是讓國民黨最後得以放心選擇鎮壓的必要條件，但絕對不是促使它打一開始便抱定主意鎮壓的充分條件。它最後之所以不得不鎮壓《美麗島》，是因為若不如此，將再沒人會相信它的權力，它將無法確保政權的「穩定」。而要說明雙方最後為何不免衝突，必須回到全國性反對運動形成後，與威權統治者的互動過程來分析（湯志傑 2006），但這已是另一段故事了。

三、正當性／權力的問題叢結： 理論架構的反省

為何審視同一段歷史，筆者卻得出迥異於王振寰的理解和詮釋？這背後無疑涉及理論觀點上的差異，並有深究的必要。因為，本文雖然同樣是從正當性／權力這組問題叢結出發，但對這卻有著全然不同的理解。有別於王振寰(1989)把正當性界定為來自有權者的支持，筆者認為，正當性與權力之所以構成一組相關的問題，在於藉由正當性的中介，暴力得以轉換成權力；而且必須從象徵的面向來掌握兩者，分析它們實際的運作，才不會落入本質論或決定論的陷阱。以下試申論之。

（一）正當性宣稱的文化建構是正當性概念的核心指涉

王振寰(1989: 75ff.)討論了三種關於正當性的不同說法，即韋伯主張的「正當性是人民對政權的認同與支持」；其次是新馬克思主義學者所說的，「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執行兩個必要而又衝突的功能：資本積累與正當化」、「福利國家的興起，就是為了解決工人可能不再忠誠的正當性危機」；最後，也是王氏引以為理論架構的，則是 Arthur L. Stinchcombe (1968)首先提出，繼而為 Charles Tilly (1985)援引的觀

點，把正當性視為「有權者(powerholders)之間的相互認可。」王文認為，這種理論觀點可以避開前兩種看法志願論傾向的問題，「能說明不受歡迎的政權仍能繼續穩定存在的原因……也能說明政治不穩定的原因」，而不致無法處理歷史事實，使得正當性的概念「常成為政權合理化其統治的藉口——因為社會秩序是穩定的，所以它是受人民歡迎與支持的」。王文並由此推論出「政權穩定存在的主要權力基礎，或政權的正當性基礎，不是人民的忠誠，而是有權勢者或外國的支持」，以及「退縮正當化」以之為基礎的一般性命題：「當一個政權的正當性發生危機，或其權力基礎發生動搖時，它必須強化原有的支持，或尋求新的有權者的支持。」

乍看之下，這不但言之成理，也是極為嚴謹的邏輯推論。然而，有得卻有失。這種純然現實「權力」論的說法，等於取消了韋伯「正當性」概念的創見，把原本指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的概念，變成用來指權力擁有者彼此之間的關係，把正當性化約成赤裸裸的武力支持（或者再加上物質資源的支持），將正當性宣稱的文化建構、說「理」⁴⁴ 成份剝奪殆盡，可說是退回到「唯物論」的立場，完全否定意識形態的可能作用。⁴⁵ 由於王振寰並未對權力概念多做解釋，而是把它當做自明的概念來使用，如果依循西方傳統的觀念，把權力理解成能違逆他人意志遂行己意的強制(coercion)的話，更容易產生這樣的印象或聯想。⁴⁶

事實上，Stinchcombe (1968: 162)最初的定義並未忽視說理的面向：

A power is legitimate to the degree that, by virtue of the doctrines

44 這不意謂著理性或合理性，而只是說出個道理或理由。

45 顯而易見，此處的「唯物論」並非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而只是借用來指過於強調物質面，全然漠視文化建構作用的觀點。

46 不過，王振寰自己好像也沒有這麼認真看待這個正當性概念，例如在他後來的著作中，便似乎不再從「有權者之間的相互認可」來界定，而是回到被統治者（對權力聯盟）的認可的立場，並特別強調了霸權的概念（王振寰 1999: 175-176）。

and norms by which it is justified, the power-holder can call upon sufficient other centers of power, as reserves in case of need, to make his power effective. (底線筆者所加)

可是，當 Tilly (1985: 171)轉述 Stinchcombe 的看法時，正當性概念所意涵的規範與說理的面向已完全不見，而被界定成「其他統治當局 (authority, 或譯做權威：筆者的註解) 願意認同某一既定統治當局決策的機率」。王振寰雖也引用了 Stinchcombe，但主要應是受 Tilly 影響，難怪沒注意到這一點。

(二) 內部／外部正當性的區分

然而，Tilly 是在現代 (民族) 國家形成的脈絡中討論正當性問題，關注的是國家如何達成 (正當) 武力獨佔的問題，處理的是統治者與統治者 (或說主權者與主權者) 之間的關係——儘管其中有吞併及從屬與否的問題。換句話說，他所探討的是沒有統治者位居其上的「國家系統」或所謂的「國際」政治系統。在這種欠缺統治權 (sovereignty) 來執行獎懲的情況下，彼此間的承認的確是正當化的唯一來源。⁴⁷ 歷史經驗也顯示，就獲得國際承認來說，合法繼承王位或甚至像人民主權等正當性的語意，實際上不會扮演什麼重要角色，而是取決於能否在特定的疆域中貫徹國家武力，而不會遭到挑戰的事實 (Luhmann 2000: 224-25; Barkun 1968; Niemeyer 2001)。⁴⁸ 如 Tilly (1985: 171-172)指出的，在一般的情況下，當出現紛爭時，其他統治當局會

47 相應地，當承認無法解決問題時，只好訴諸武力。如 Arendt (1972: 107)說的，戰爭的主要原因並非源自什麼神秘的死亡趨力或無法抑制的侵略本能，而不過是來自國際事務缺乏最終的仲裁此一簡單事實。

48 儘管能否在特定疆域內貫徹統治基本上並不依賴於國際承認，但在實現了統治的事實後，這樣的承認卻往往是必要的證明。換句話說，雖然現實政治才是決定某一政權在國際上能否被承認具有正當性的最重要因素，但與現代世界政治系統的形成相互建構的「正當性」論述，也就是「主權」論述，還是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我們可以從十九世紀殖民帝國主義的歷史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在列強處於某種權力均勢此一必要的現實政治前提外，非西方政治體能確保某程度的主權地位，而不是淪為西方強權的殖民地或列強瓜分的勢力範圍，也跟它是否能成功地學習並運用這套源起於西方的正當性論述來進行象徵鬥爭有關 (Strang 1996)。

傾向於支持掌控有實質武力者。這不單是出於害怕報復的緣故，同時也是為了維持一個支持這個一般規則的穩定環境。而這樣的規則自然會為統治當局的武力獨佔背書。

「對正當武力的獨佔」正是韋伯對國家的經典界定，⁴⁹ 他主要也是在這樣一個有統治權高居其上的脈絡中來討論正當性問題。⁵⁰ 一旦討論是在此一框架內進行，也就是僅及於內部正當性的問題時，那麼我們固然不能排除，內部「有權者」的支持對政權可以有正當化的作用，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中，正當性指涉的主要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因為最終說來是統治權在被統治者眼中正當與否的問題。同時，統治權的存在，也使得內部正當性與外部正當性所涉及的情形產生關鍵性的差別。

首先要指出的是，Stinchcombe (1968: Chap. 4)其實是在討論如何概念化權力現象的脈絡中附帶提及正當性概念。其次，他對權力採取寬鬆的界定方式，除了指對人的支配之外，也試圖把對物的支配包括進來。例如，他把訴請制止同業在隔壁開業競爭也看成是權力的使用。從這樣的例子，我們不難看出，他其實是在預設了國家統治權的前提後，把私人之間的「權力」關係當做分析的對象，以貼近日常生活的現實。這個例子顯示出，私人的「權力」（更精確來說應該是：權利主張）往往是藉由訴諸國家權力的中介來確保及實現，所以Stinchcombe (1968: 150, 159)認為「被權力加諸其身的人不如其他權力擁有者來得重要」，「正當性宣稱能否得到權力中心的支持才是關鍵，至於必須承受後果的那些人是否認為這是正當的並不重要」，因為對擁有制止同業開業「權力」的人來說，重要的是國家機器支持他

49 在歷史上，這即是 Foucault (2000b: 42-43)所說的「戰爭國家化」的過程，但英譯只提及國家對戰爭的獨佔(Foucault 2003: 48-49)，沒有「國家化」的概念。由於「國家」實是近代西方才有的產物，所以韋伯這個定義基本上沒什麼大問題。不過，當我們把「國家」的歷史語意轉換成分析的概念，以回溯的角度把歷史上其他的政治支配形式也當做「國家」觀察時，壟斷所有的正當武力就不再是必要條件了(Mann 1989: 11; Tilly 1990: 19ff.)。

50 韋伯其實也談外部正當性，根據 Collins (1986: Chap. 6)的詮釋，外部正當性甚至是更為根本。但 Collins 也強調，韋伯是用外部正當性來解釋正當性情感的來源及強度，跟習知的、探討（內部）正當性結構化的方式的類型學並不矛盾。

的「權力主張」是正當的，而不在於被制止者、被權力強制者是否接受這是正當的。

由此不難理解，正當性並非來自被統治者（＝被權力加諸其身者）的認可，而是來自其他權力擁有者的支持此一假象，不過是因為 Stinchcombe 將「國家」拆解成許多個權力中心，讓它退居中介變項，對權力採取特殊界定，卻又不去追究為何國家的權力是正當的這個根本問題才造成的。⁵¹ 事實上，他不但是在國家「之內」而非之間的架構中來設定正當性問題，而且表面上雖把正當性問題的關鍵轉移到權力擁有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某人的「權力」以之為支撐的說理或正當性主張是否能得到其他權力擁有者的認可，實際上講的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因為所謂的其他權力擁有者指的是國家機器的某部門而非另一個國家機器，所以最終說來還是某一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如果這點在前面涉及兩個私人間關係的例子中尚不明顯，那麼在他舉的嫌犯可在法官面前反駁警察使用權力的正當性宣稱，或者說與之競逐正當權力使用的例子上，就更清楚了，因為不論是警察還是法官，都只是代表國家行使權力，而不是他們私人擁有這樣的權力。從這樣的角度來解讀，Stinchcombe 其實是在國家獨佔正當武力的前提下細緻地說明了權力如何發揮作用，是開展而非取代韋伯的理論。⁵²

由此出發，我們固然可以同意 Tilly (1985) 說的，國家對人民來說提供了雙重意義的保護，因此也是種組織性的犯罪，與幫派無異。但兩者就正當性來說畢竟有別，如 Stinchcombe (1968: 159) 指出的，如果警察無法制服罪犯，他可以不斷地搬救兵，甚至出動軍隊，直到成功地將罪犯繩之於法為止。因為他代表著「正當的」權力，可以得到國家這個最終正當權力來源的支持。這不但彰顯了有無統治權的關鍵差

51 雖然 Stinchcombe 對國家權力何以是正當的這個根本問題毫無著墨，但當他把觀察的焦點鎖定在支撐某人「權力」的說理或正當性主張，是否能得到其他權力擁有者（最終來說是國家）的認可時，卻也引進了偶連性的觀念，提醒我們注意不同正當性宣稱間的競逐，有其貢獻。

52 Stinchcombe 自己也清楚地意識到，他的講法與韋伯的說法各有其較適用之處，不是一種全然的取代關係(1968: 199)。

別，也觸及了區別外部正當性與內部正當性的必要性。畢竟，兩者間雖然會有相關連動的情形，也就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相互強化的作用，但終究屬於不同的面向，彼此不但無法完全互相替代，也沒有必然的關連。國際承認雖有助於政權在內部獲得正當性，但無法予以保證。反過來，不論政權在內部有多高的正當性，若它無法實際遂行支配，往往也難以爭取到國際的承認。

（三）正當性與政權的穩定性無必然的因果關係

至於王文批評韋伯的正當性概念會導致「存在的即是正當的」，使得不受歡迎的政權亦得以合理化其統治的問題，某個程度上是強加之罪。因為，韋伯從未將政權的正當性等同於穩定性，亦未主張兩者間有因果關聯，認為正當性是政權穩定的必要條件，更不用說是充分條件了。⁵³ 韋伯的看法是：每一個支配都會試著喚起或呵護對它的正當性信仰，以及，如果人們不是只基於畏懼或目的理性的動機服從強制權威的話，那麼他們必然會有對此正當支配權力(Herrschaftsgewalt)的信仰(Weber 1980: 16ff., 122ff.)。據此，邏輯上的推論至多是，任何只以武力為憑恃、而不設法培養人民對其統治正當性信仰的支配，將是不穩定的；而不能說成只要是穩定的政權，便是有正當性的政權。再者，不穩定離實際採取行動推翻，也還有一大段距離，有待其他「中介變項」介入。

同時，穩定與不穩定，更涉及是哪一個觀察者的觀點的問題。有可能在某一外部觀察者眼中穩定的獨裁政權，獨裁者自己卻是一直活在驚疑不定之中，一天到晚提心吊膽，害怕失去政權，即 Stinchcombe (1968: 162)所說的，「在不穩定的權力系統中，大部分的能量都用來防衛權力，而不是有用地使用它們」。在社會學發明了正當性的概念後，統治當局會用穩定或安定來證成自己具有正當性，毫不令人訝

53 把正當性與穩定性混同毋寧是王振寰自己擁護的觀點。也因此，他才會這樣解讀韋伯，並歸納出下述的結論：「政權穩定存在的主要權力基礎，或政權的正當性基礎，不是人民的忠誠，而是有權勢者或外國的支持」(1989: 79)。

異，也不必就此歸罪於社會學。這種正當化論述只是身為行動者的統治當局的觀點，不但必須跟其他行動者的論述競爭，也有遭遇抵抗的可能。身為觀察者的社會學家應該去分析這種論述是否，以及產生了什麼作用，而不是倒過來拋棄正當性概念的說理成份。

王振寰所謂「國內有權者的支持」，直接相關的其實是政權的穩定性，⁵⁴ 和統治的正當性只有間接關係，也就是那些具影響力的「有權者」（如地方派系和資本家，同為國家機器一環的軍方就不盡適用）的支持，具有間接正當化既有政權的象徵作用。正當／穩定的區辨帶出一個重要的面向，亦即在正當性的問題上，不應囿於社會學慣有的模式，執著於確認出具有不同屬性的社會群體，假定他們內部有一致的立場與利益，進而分析他們的行為。當我們從論述所具有的正當化作用的角度切入，群體的界限不必總是重要的參考點。⁵⁵

（四）應從象徵建構和鬥爭的角度來看正當化策略的競逐

由上述討論不難看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對於統治是否具正當性、為何具正當性，可以有不同的觀察。這正指出，正當性涉及實際武力支配之外的象徵正當化（及相應的象徵鬥爭）問題，這個文化象徵意義的面向才是正當性概念的核心。用韋伯的話來說，即正當性能使權力變成權威；從 Luhmann (1976, 1988, 1991b, 1991c) 的觀點來看，更精確的表述毋寧是，正當性使得暴力或說武力 (Gewalt, violence) 轉換成權力 (Macht, power)，⁵⁶ 暴力／權力的區分才是關鍵所在。⁵⁷ 所以，

54 另像龔宜君(1998)根據 Michael Mann 基礎權力的概念，從所謂滲透的角度切入，關心的也比較是穩定性（如她的副標題明示的：政權的社會基礎），而不是正當性的問題。

55 雖然 Gramsci 試圖以「歷史集團」的概念來掙脫馬克思主義僵固的階級分析觀點，但後來對霸權概念的應用，往往還是過強地與階級連結在一起。不過，Laclau and Mouffe (1985)採取反本質論的立場，從政治對抗和論述的銜接實踐的角度重新詮釋霸權的概念，跟本文採取的系統理論的進路就有相當的親近性——排除兩者在一些看法上的重大差異不論的話(Stäheli 1998)。但限於篇幅、本文原有的架構及筆者目前的能力，在此無法將霸權的概念，尤其是 Gramsci 以後，如 Michael Burawoy、James Scott、Bob Jessop 等的進一步發展納入討論。

56 這可與 Foucault (2003: 24, 26) 的說法比較：「除非有某一特定真理論述的經營(economy)在權力之中運著作，而且這個經營是建立在這個權力的基礎上，歸功於這個權力，否則權力無法被使用」，「我們被權力強迫著生產真理，權力需要這種真理，才運作得

的確如 Stinchcombe (1968: 161) 指出的，權力若只建立在民意與自願服從意願的基礎上，必然是不穩定的。韋伯自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說的其實是：權力若要穩定，只靠有形武力是不夠的，而必須將它一定程度地正當化，轉化成權力。Stinchcombe 其實已正確掌握到這一點：

「正當性學說的決定性功能在於藉著設立諸權力的網絡連結，從而使得訴諸實際的暴力使用變得不必要。」（楷體筆者所加）⁵⁷

相對地，如 Pierre Bourdieu (1991: 127f) 所說：「政治上的顛覆以認知上的顛覆、以世界觀的轉換為前提。」唯有當反對者在象徵的層面上建構出替代的論述，對現況和問題予以分析及歸因，並賦予替代方案意義，才能有效地動員支持，形塑認同，來挑戰既有的政權。⁵⁸ 就這點來說，反對人士以諧音「顧面盆」來「虧」（揶揄）國民黨，或是自稱「黨外」，稱國民黨為「外來」政權，批評它是不民主的威權統治等語言顛覆，乃至提出台獨或台灣民族論述，都是關於正當性象徵鬥爭的建構，也都必須放回到此一脈絡來理解。我們不能忽視這種設定討論或溝通的框架所能產生的作用，如台灣經驗顯示的，民主的問題之所以會在政體轉型過程中與民族的問題糾纏不清，追本溯源，跟國民黨政權退居台灣後採取的正當化策略有關。環繞著正當性的問題，將開展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執政者與反對人士相互觀察的空間，在其中，彼此對對方的觀察不只會影響到自己的行動，也會影響

起來」，以及「法律（按：英譯作權利，right，但從上下文來看，法律應較適當。當然，這跟法律與權利在西方語言中常係同一字有關。可與中譯本[Foucault 2000b: 25]比較）技術和論述的根本功能在於解除權力中的支配元素，以及用下述兩種東西來取代必須加以化減或遮蔽起來的支配」（底線筆者所加）。

57 這個說法比韋伯正當性將權力轉為權威的說法為佳，因為韋伯的看法固有其見地，但是，在西方從階序的階層分化社會向現代無中心的功能分化社會轉型，以執政／在野對政治權力進行第二次符碼化時，人們放棄了統治暴力具有權威、代表正確意見的看法，另外發明了所謂的「公共意見」作為權威的來源，成為政府與反對黨政治運作的取向標的(Luhmann 1994: 128)。

58 當然，Stinchcombe 的重點是擺在權力的網絡連結，而不是象徵的正當化作用。

59 這個認知、歸因與文化建構的面向，在試圖結合結構分析與動員過程來研究社會運動的文獻中，已日益受到注意(McAdam 1999, 2003)。以台灣的例子來說，王甫昌(1996)便從「共識動員」的角度分析反對運動在 1979 年到 1989 年間如何動員支持，比較了它之前的民主訴求與之後民族主義動員策略的異同，而李丁讚、林文源(2000)亦在「文化構框」進路的指引下，探討了環境權感受如何形成，從而充當了社會力的文化根源的問題。

到對方的行動。

（五）減低正當性概念的價值意涵

不過，如果繼續循著韋伯的進路，把正當性理解為被統治者的「贊同」的話，還是很容易因為此概念的「價值」意涵而陷入爭辯或困擾之中。⁶⁰ 只是解決之道不應在於模糊權力與暴力的差異，而在於儘可能地降低正當性概念的價值意涵。對此，Luhmann (1989: 28, 34) 的建議或許值得考慮，也就是不把正當性視為建立在「自願的」承認，或建立在個人得自行負責的「被說服」的基礎上，而僅是指「在某一容忍界限內接受內容尚不確定的決策的一般性準備」。⁶¹ 換句話說，不必把事先便接受政治決策具有一般性的拘束力等同於對政權的贊同，但又不應忽略，這種事先的一般接受準備，與當下的、因著強制或考慮到負面懲處才採取的特定作為，有著關鍵性的差異。不過，如 Luhmann (2000: 122-123) 也指出的，其實很難把價值關聯從正當性的概念中完全抽離。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正當性取代了以往公共福祉扮演的偶連性公式(Kontingenzformel)的角色，控制通往其他可能性的管道，將不確定的複雜性轉變為確定的或可確定的複雜性。所以，在重新界定正當性，減少其價值意涵的同時，更重要的毋寧在於從象徵與意義建構的角度來分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各使用了什麼策略來正當化與反抗。

（六）權力主要繫於暴力的象徵性使用

雖然王振寰(1989)不曾討論權力的概念，但從他執著於「有權者」的觀念，及確認地方派系、資本家和軍方為有權者來看，或可推論說，他一定程度上仍持傳統的觀點，從行為的因果性、從命令與服從

60 Gramsci 建基於武力／同意二分基礎上的霸權概念也有同樣的困擾，後繼的應用者還常有機械式套用的問題(Lears 1985)。雖然他指出了同意的曖昧性，提出較原有「虛假意識」更能自圓其說的「矛盾意識」的說法，但終究無法完全避免價值意涵的問題。

61 筆者的強調。「準備」的原文係 *Bereitschaft*，這個字在德文中雖也可指意願，但沒有這麼強的肯認意涵，就如其形容詞 *bereit* 的用法，表示準備好接受既成的事實或即將面臨的遭遇。

的對應關係來理解權力，把權力視為可擁有的物，可根據擁有的武力或資源大小來衡量。對這種觀點來說，區辨暴力和權力沒有太大的意義。這種觀點沒有看到權力的象徵面向，沒有掌握到在正當性的中介下，從暴力到權力的轉換，也因此沒有深入掌握到權力與正當性的關聯，了解到權力不是個定量的死物，而是在同樣的物質基礎上，可以有所增減的象徵一般化的溝通媒介。

權力跟暴力有關，幾乎是理所自明。以西方的觀念來說，權力通常意指決定另一個人的行動的意欲能力，因此需以暴力、至少是進行負面懲處(negative sanction)的能力為支撐，一般不會有異議。⁶² 用白話來說，若不是因為擔心可能的懲處對身體造成不利（不論是直接的傷害，還是沒錢餵養這副臭皮囊），權力無從發揮作用——儘管通常只要權力臣服者預期會有懲處後果就夠了，根本不需明刀明槍地予以威脅。

只是，權力誠然需要暴力作為「共生的機制」，來規制象徵媒介與有機體的過程的關係(Luhmann 1976: 523, 1991b: 181, 1991c)，卻不等同於暴力，而主要是涉及暴力的象徵性使用，更多依賴於權力施行者與權力臣服者對彼此觀察的觀察，比較少是透過前者實際上不斷進行威嚇，或後者不斷予以挑釁來確認的。作為象徵一般化的溝通媒介，⁶³ 權力的作用在於傳遞選擇性(selectivity)，也就是使得他我（＝居於權力優勢者）選擇的選擇性得以傳遞給自我（＝居於權力劣勢者），成為後者選擇時的前提。權力之所以能夠規制選擇的傳遞，使得他我的行動變成自我行動的前提，在於它建構出一個他我和自我都想避免、而且自我比他我更急於要避免的負面替代方案(Luhmann 1969,

62 Weber (1980: 28)的經典界定即是：「權力意指在某一社會關係中，即便在遇到抵抗的情況下，也能貫徹自己的意志的機會，而不論這一個機會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相應地，對西方來說，必須將權力與透過勸服或道德表率獲得的影響力(influence)區別開來。但就華人的傳統來說，自不必然如此(Hamilton 1989；翟本瑞 1999)。事實上，在今天的西方，像 Knoke (1990: 3ff.)也承認說服性權力的存在，Mann (1989: 22ff.)則是把意識形態視為權力來源之一。

63 這指權力、貨幣、影響力、真理、愛等提高溝通被接受機率的「成功媒介」，有別於語言、文字、印刷術等擴大溝通接受者範圍的「傳播媒介」(Luhmann 1997: 202ff.)。

1976, 1988, 1991b, 1997: 203-204, 316ff.)。根據這種觀點，處於權力關係中的雙方都不只有一個選擇，而是有相當的開放性與自由度。相應地，權力不是某種得以佔有的「物」，並且與強制、暴力判然有別，因為後者事實上是放棄駕馭對方的選擇性，等於拿刀架在別人脖子上，說一動才做一動，完全喪失象徵媒介化約複雜性的好處。⁶⁴

權力之所以能在即便令人覺得不快的情形下，還是能提高溝通被接受的機會，在於它能無視於參與者的動機差異，創造出一個普遍且迅速被接受的情境定義。所以，權力要能發揮作用，需要溝通的兩造共同認定或接受當下是以權力來進行溝通，亦即被支配者「支持」統治者「有權力」的看法，並以此作為他進一步選擇的前提。從這個角度來看，權力的運作是「當事人」之間的事，與其他人支持與否無關。同時，一般人多半只是「同意」統治者「擁有權力」的事實（乃至假定），不必然就表示完全支持或認可後者的統治。

（七）同樣的物質基礎可創造出不等量的權力

循此，如王振寰批評的，以大眾的忠誠或政權受不受歡迎來界定正當性，負載了過多的價值意涵，並不適當。不過，像王振寰般改以有權者的認可來界定，一樣沒掌握到權力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如前面指出的，唯有居於劣勢者接受權力這個溝通媒介所建議的情境定義，權力才能真正產生效用。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一旦被

64 這種看法與 Foucault 的觀點不無呼應之處，可相互啟發（但請見姚人多(2000)或有不同的看法）。例如 Foucault (2000a: 340-341, 346; 2003: 13ff., 29, 35-36)也批評了傳統將權力想像成可佔有的物，從而是可佔有、獲得、交換的看法。用他的話來說，權力「主要是一種力量關係」，而不是某種本質性的存在，它「只在行動中存在」，並且「是這樣一種行動模式，它並非直接且立即地施加在其他人身，而是作用在他們的行動上」，應把它當做「某種循環流動的東西，或是當做只有當它是鏈的一部份時，才能運作得起來的東西」來分析。而且，只從「壓制」(repression)或暴力來理解權力是不夠的，因為這等於封閉了所有的可能性，放棄了權力的「作用」(effect)，但「若是欠缺了暴力或是同意，權力的使用也就無法生效」。事實上，「任何的權力關係都意涵了一個鬥爭的策略」，有逃離的可能，所以權力基本上是個「治理的問題」，也就是「對其他人可能的行動場域加以結構化」的問題。在他看來，十七、八世紀新出現的權力經濟學的原則是「既增加被征服者的力量，又提高征服者的力量和效率」。從溝通媒介的觀點來看，這個被他稱做「紀律化的」權力的偉大發明並不難理解，因為，提高權力臣服者的能力正是增加權力施行者的權力。

支配者根本就不怕死、不承認統治者的暴力是正當的（即不承認後者擁有權力），那麼再多的暴力也無法創造出權力的作用。這個象徵性的作用同時指出了，權力不是一種零合關係，也無法用軍隊的多寡、武力的強弱等來衡量，而是可以有所增減，或是借用貨幣這個溝通媒介的語言來說，是可以增值、貶值，乃至過度膨脹或緊縮。⁶⁵

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的過度膨脹指的是，溝通過度透支它的信任潛能，亦即預設了多於它能製造的信任；過度緊縮則是雖有許多獲得信任的可能性，卻未被利用。當政權獲得多於它實際上所能控制的經濟資源的授權，或人民支持的上升速度遠比假定是它必須負的運作責任的增長速度要來得快時，也就是當權力範圍超過實際上執行具拘束力決策的能力時，便可能出現權力的過度膨脹。反過來，當假定政權所須負的運作責任超過它所獲得的授權，或政權耗費了可觀的經濟資源提升人民對生活的滿意度，但所獲的支持卻遠不如預期時，便可能出現權力緊縮的情形。而且，在面對權力緊縮時，當權者常訴諸強制手段，這個方法表面上看來廉價且效果迅速可見，實際上卻是走向惡性循環。儘管如此，除非出現超級膨脹或超級緊縮的極端情形，也就是根本拒絕接受象徵，或根本不再有溝通出現，否則一般而言，多少存在著對系統整體的信任(Luhmann 1997: 83-84; Gould 1987: 44-45, 54ff., 103ff.)，也就是多少還承認權力的作用，而不會只看成是暴力。

相較於王振寰追問「其他有權者的認可」，似乎正當性和權力可以根據有權者的支持來累加，本文改從視權力為溝通媒介的觀點出發，因此能不迷惑於威權政權外表的強勢武力，或是與資本家、地方派系等強而有力的結盟，先入為主或本質性地認定國民黨政權擁有強大的正當性與權力，因而是穩定的。從權力主要涉及暴力的象徵性使用這點切入，筆者有能力看到威權統治內含的弱點與權力不足的通病，看到在同樣的物質基礎上，權力可以有大有小，並解釋這個變化

65 Stinchcombe (1968: 162-163, 165, 168)因接受模控學(cybernetics)的一些想法，引進訊息量的觀念，所以也有類似本文提及的權力並非定量、容許自由度，以及人們若不怕死，權力便喪失作用的想法。

的可能性。

（八）引入民主機制有助於正當化

最後，必須簡短探討一下正當性／權力這組問題跟政治的關係。政治的功能在創造出具集體拘束力的決策，亦即，政治關心的是在決策前便籌措到足夠的執行權力及／或足夠的共識(Luhmann 1995: 104)。就達成此一目標而言，在較簡單的社會中，政治支配或許只要藉著動用具優勢的有形強制，或是對巫術或宗教制裁的信仰，或是能控制某部分的經濟分配過程就夠了。然而，隨著政治系統的環境及系統自己製造出來的複雜性不斷地增加，政治系統必須找到或發明新的化約複雜性的策略或機制。要應付不斷升高的複雜性，不但要容許將任何的議題予以政治化，還要讓人們幾乎不需有什麼特定的動機，便願意接受決策具有拘束力。這意謂著，政治系統甚至必須能事先便確保合法性(legality)的正當性(Luhmann 1991a: 159, 169)。⁶⁶ 換句話說，能創造出愈多可供運用的權力，讓暴力的使用變得愈不必要，才是愈高明的統治術，政權也才愈穩定。⁶⁷

為了能應付自己以及它的環境的高度複雜性，政治系統必須事先對可忍受的不確定性有所準備，亦即必須提升自己的複雜性、彈性、可變性及選擇性。依系統理論的看法，這不但要求分化出權力這個溝通媒介，還要讓權力變成是反身性的，也就是應用到自己身上，就現代的實際情形來說，即是民主。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國民黨政權最初在台灣不只面對著正當化的難題，同時也面臨著權力不足、乃至某種程度的權力緊縮的問題。相應地，隨著外部正當性危機的出現，同時也是為了解決權力不足的難題，在 1970 年代初才啟動了政治的轉型。唯有掌握到民主機制的引入有助於正當化，有助於國民黨政權籌措必

66 此處說的是，愈成功的政治支配愈有能力把合法性變成就是正當性，而不是 Habermas (1973: Part 3)批評的，主張合法性等同於正當性的「社會工程學」。

67 用馬克思主義的語彙來說，只有弱的國家才常常需要依賴威脅或使用隱涵在支配之中的武力；強的國家幾乎只透過霸權來統治(Adamson 1980: 170)。

要的共識，從而增加了它的權力，我們才能了解，為何 1972 年的政治轉型，一個在王振寰或政體轉型理論眼中微不足道的改革，卻可有偌大的效果，不只成功化解國民黨的統治危機，實際上更啟動了整個威權統治結構的轉型。

四、比較與討論

有別於王振寰(1989)以「有權者的認可」來界定正當性，試圖讓政權的正當性與穩定性在概念上脫鉤，卻弔詭地令兩者混淆起來，本文一方面主張回歸以象徵的面向來理解正當性的社會學傳統，另一方面強調必須跳脫傳統的權力觀，不宜再把權力看成說一動做一動的行為對應，而是要理解為在同樣的物質基礎上，可以有所增減的象徵一般化的溝通媒介。有別於王振寰仍執著於「有權者」的觀念，筆者認同 Foucault (2003: 28-29)不要問「誰擁有權力？」的方法論提醒，因為個體「總是處於既臣服於權力、又運用權力的位置」，這才是不斷生成變化的社會現實。如前面的分析顯示的，不論正當性還是權力，都涉及「觀察」的問題。這個運作建構論的觀點，要求我們以實際的正當化及權力運用過程作為分析的焦點，掌握在不斷變動的偶連性的銜接中形成的結構，不但較切合現實，也比較不會落入決定論、或理論邏輯想當然爾的陷阱。

前述這些既涉及認識論、也涉及存有論的區辨，是極為關鍵的差異。如本文第二節的歷史重構分析顯示的，從運作的角度切入，找回正當性及權力被遺忘的象徵面向，同時不忘記作為它們基礎的物質面向，至少帶來如下的好處。首先，本文看到了王氏及迄今多數研究忽略的象徵的面向，實際探究並解釋論述及政策作為的正當化作用，說明為何原本可有效正當化的法統論述得以被解構，又為何「革新保台」的論述能夠在當時的情境下成為各方都可接受的解決方案，成功化解危機。其次，從象徵鬥爭的面向切入，本文連帶看到了公共領域有促成政治轉型的功能，扮演著結構可能性的角色，這是至今仍鮮為

人注意的。第三，本文還看到外部正當性的問題只扮演了催化劑的角色，實際上一直存在著，也無法藉由內部的正當化來轉移，並對此提供一套合理的解釋。第四，從論述的角度切入，本文得以掙脫以「群體」為焦點的分析模式的限制，解釋為何在沒有反對運動及群眾動員的情況下，仍可出現制度改革與政治轉型。第五，從象徵的面向來理解正當性／權力的關聯，本文看到了國民黨並非藉加強與地方派系的結盟，而是以開放中央層次的選舉，來強化對內正當化，並且解釋了為何儘管統治者的權力基礎沒有改變，卻可藉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改革，增加統治者的正當性與權力，成功化解統治危機。

此外，從正當性與權力的連動關係，從不時變動的象徵鬥爭的視角出發，也讓我們對偶連性更為敏感。本文不但討論了威權統治結構內含的不穩定性，同時也明確指出權力繼承與外部正當性危機匯聚的歷史偶連性在促成改革上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找回「轉型往往始於威權政體內部的重要分裂」(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19)這個被遺忘的政體轉型模型的標準觀點，另一方面也指出，正是因為研究者應用了政體轉型的階段模型，才弔詭地對這一波政治轉型中的權力繼承問題視而不見。

回歸實際歷史過程，正視偶連性的作用，不但讓我們有能力糾正王氏犯下的歷史錯誤，澄清國民黨在 1970 年代是希望取代地方派系，而不是要強化與它們的結盟，以及鎮壓美麗島是為確保政權，而與正當性的問題無關，同時也進一步促使我們反省應用政體轉型模型的利弊得失。政體轉型模型雖提供了好用的架構，也帶來不少洞見，卻也很容易讓我們忽略本地政治發展的特殊性，忽略台灣戰後政體轉型的肇始其實必須追溯到 1970 年代初的政治轉型——如果我們改從歷史的連續／不連續，以及結構的持續／改變的觀點來看，而不是採取政體轉型模型的界定的話。

五、結語

從國民黨政權在 1970 年代並未強化與地方派系的結盟此一歷史事實出發，本文檢討了國民黨當時藉此進行由外而內的正當化的流行說法，指出以「有權者之間的相互認可」為正當性的理論架構如何讓人看到想看到的「事實」，卻也讓人看不到它看不到的東西。從把正當性重新拉回來指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從象徵建構與鬥爭的角度來理解，同時把權力視為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等觀點出發，本文重新詮釋了 1970 年代初由外而內的正當化的意涵。本文發現，外部正當性危機固然是引發轉型的重要觸媒，但轉型之所以會在沒有明顯大眾動員的情形下出現，除了適逢國民黨政權內部權力接替過程，以及國民黨必須解決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權力不足的統治難題外，也跟它一向以來的正當化論述，跟當時人們如何界定現實與危機，以及公共領域中的異議聲音有關。

國民黨並非以加強與地方派系的結合，而是以「革新保台」的本土化政策與論述來進行內部正當化。而且，雖然此次的轉型主要是涉及政權內部的調整，不符政體轉型模型界定的政治「自由化」或「民主化」，但畢竟開放了中央政治參與的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改變，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促成了全國性反對勢力形成此一重要後果。隨著反對陣營的出現，才牽動了國民黨、地方派系與反對人士三者間賽局結構的轉變，從而埋下進一步變革的潛能。因此，這一波轉型雖看似不起眼，且因無法歸類到政體轉型文獻常談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等概念下，也難以統治集團中的鴿派／鷹派和反對陣營中的溫和派／激進派的分類架構來分析，⁶⁸ 以致常有意無意地被忽略，⁶⁹ 實際上卻是奠定戰後台灣政體轉型的起點，

68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74, 註 1) 也提醒說，鴿派／鷹派的區分只是啟發的工具。

69 早期的研究毋寧更關心轉型如何可能，或是為何威權政體能持續下去，不太關心起點的問題，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相當程度決定了接下來的發展走向，不容忽視。

自王振寰（1989）一文發表以來，十幾年過去了，國際學界已有不少檢討、反省政體轉型模型的聲音(Bunce 1995a; Carothers 2002; Gazibo 2005; Mahoney and Snyder 1999)，就國內的情形來說，似也到了值得重新權衡應用政體轉型模型得失的時候。如 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1991)及 James Mahoney (2001)指出的，政體轉型往往是個路徑依賴的過程，而台灣戰後的政治發展，無疑有極其獨特的歷史脈絡，舉凡由殖民地「回歸祖國」、冷戰結構下繼續擁有國際承認、以「族群」而非階級為主要社會分歧、本省籍的李登輝繼任威權體制的最高統治者等等，都是相當特殊而罕見的情形，不但本身便是值得做深入分析的個案，更可由此重新審視既有的理論架構，提出新的替代理論觀點。

像王振寰自己也看到有 1972 年及 1986 年兩波的轉型，並且強調不可忽略 1972 年的轉型。可惜的是，儘管王氏注意到台灣政治發展的脈絡特殊性，但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而且因為引用政體轉型模型的緣故，毋寧還是認為台灣的政體轉型始自 1986 年。這便弔詭地為日後的研究取向定了調，後繼的研究不但紛紛把目光投向 1986 年以後的發展，更日益輕忽或遺忘台灣本身發展的特殊性，往往只是把本地的素材塞入政體轉型的理論架構中，而不企求先適切地掌握現實，再讓理論與事實有辯證的對話，進而謀求提出自己的解釋架構與理論。

本文之所以嘗試在舊瓶中注入新酒，從正當性／權力的觀點重新詮釋「由外而內的正當化」，即是著眼於對這段歷史的正確掌握其實是了解台灣戰後政治發展的關鍵，然而流行的解釋觀點卻是建立在錯誤的事實和不當的概念使用基礎上，實有更正的必要。舊題新做，目的無非是希望在既有研究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為建構更完整的歷史圖像、提出台灣自己的理論，擺下一塊在我看來比較好的踏腳石。

誌謝：感謝吳介民、林文凱、陳中芷、李令儀、吳仕侃、黃瑞祥對本文不同階段

草稿的批評與指正，以及吳乃德在文獻及實質問題上提供的諮詢。其次，要謝謝評審和編委會，尤其是主編謝國雄，就文章內容、結構和題目所提出的深入針砭與寶貴建議。李航、關凱元、顏勝駿、蔡基祥在寫作上的協助，以及謝麗玲細心、專業的編輯，為本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貢獻，在此一併致謝。最後，更要謝謝王振寰寬容大度的前輩風範，不但不以本文的批評為忤，還不吝對本文不成熟的初稿提出精闢的批評與建議。

參考文獻

- 大學雜誌(1971.01-1972.04) 37、46、49、50、51、52 期。
- 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 1: 129-209。
- 王振寰(1989)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1): 71-116。
- (1993)台灣新政商關係的形成與政治轉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4: 123-163。
- (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
- (1999)邁向常態化政治：臺灣民主化中統理機制的轉變。見林佳龍、邱澤奇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頁 153-188。台北：月旦。
- 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0: 17-55。
- 古淑芳(1999)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田欣(1996)「外省人」自由主義者對「台灣前途」的態度——以雷震、殷海光及傅正為例。見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頁 331-351。台北：吳三連先生基金會。
- 江宜樺(2001)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聯經。
- 艾琳達(Arrigo, Linda Gail) (1998)激盪！台灣反對運動總批判。台北：前衛。
- 汪宏倫(2001)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 1: 183-239。
- 吳乃德(1989)搜尋民主化的動力——兼談民主轉型的研究取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1): 145-161。
- 吳乃德、陳明通(1996)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歷史形成。見張炎憲等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頁 351-385。台北：玉山社。
- 李丁讚、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1970-8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8: 133-206。
- 林佳龍(1998)臺灣的選舉與國民黨政權的市場化：從威權鞏固到民主轉型(1946-94)。見陳明通、鄭永年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頁 169-259。台北：月旦。
- (1999)解釋臺灣的民主化：政體類型與菁英的策略選擇。見林佳龍、邱澤奇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頁 87-152。台北：月旦。
- 杭之(1990)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初步考察——一九七五—一九八五。見杭之著，

- 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上），頁 45-70。台北：唐山。
- 洪三雄(1993)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台北：自立晚報。
- 若林正文(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洪金珠、許佩賢譯。台北：月旦。
- 南方朔(1994[1979])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見南方朔著，自由主義的反思批判，頁 115-176。台北：風雲時代。
- 倪炎元(1995)東亞威權政治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台北：月旦。
- 姚人多(2000)論傅柯的〈主體與權力〉——一個批判性的導讀。當代 150: 126-133, 151: 108-133。
- 陳明通(1995)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
- 郭正亮(1988)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轉化：1945-88。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俊宏(1977)我的沈思與奮鬥：兩千個煎熬的日子。台北：作者自行發行，三榮印刷。
- 張茂桂(1993)社會變遷與社會力的釋放。見江炳倫編，挑戰與回應，頁 1-40。台北：自由基金會。
- 國史館編(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台北：國史館。
- 許宗力(1992)法與國家權力。台北：月旦。
- 湯志傑(2004a)藉公共領域建立自主性（上）：對西方公／私區分語意及結構之探討。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10: 121-184。
- (2004b)封建帝國的形及其分化。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 36: 63-112。
- (2006)勢不可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投稿審查中）
- 彭懷恩(1989)台灣政黨體系的分析(1950-1986)。台北：洞察。
-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編(1999a)珍藏美麗島口述史，一。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台北：時報。
- (1999b)珍藏美麗島口述史，二。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台北：時報。
- 翟本瑞(1999)權力試釋。見翟本瑞著，社會理論與比較文化，頁 1-28。台北：洪葉文化。
- 鄭牧心(1987)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 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
- 薛化元(1996)《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台北：稻香。

- (1999a)《自由中國》雜誌歷史定位的再思考。見台灣歷史學會編，史學與國民意識論文集，頁 213-232。台北：稻香。
- (1999b)戰後台灣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互動的一個考察——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的國家定位為中心。當代 141: 32-45。
- 蕭阿勤(2003)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 1970 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 5: 195-250。
- 龔宜君(1998)「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台北：稻鄉。
- Adamson, Walter (1980) *Hegemony and Revolution: A Study of Antonio Gramsci'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rendt, Hannah (1972) *Crises of the Republic: Lying in Politics, Civil Disobedience on Violence, Thoughts on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Austin, John L. (1997[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nd ed. Repri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arkun, Michael (1968) *Law Without Sanctions: Order in Primitive Societies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erman, Daniel K. (1992) *Words Like Colored Glass: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 Symbolic Power*. Translated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nce, Valerie (1995a) Should Transitologists Be Grounded? *Slavic Review* 54(1): 111-127.
- (1995b) Paper Curtains and Paper Tigers. *Slavic Review* 54(4): 979-987.
- Carothers, Thomas (2002)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1): 5-21.
- Cheng, Tun-jen (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4): 471-499.
- Chu, Yun-han (1992)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 Collier, Ruth Berins, and David Collier (1991)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Randall (1986) *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 University Press.
-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rvice (1967) *China and U. S. Far East Policy 1945-1967*.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rvice.
- Foucault, Michel (2000a)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3. Edited by James D. Faubi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2000b)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必須保衛社會，法蘭西學院演講系列 1976，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3)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76*. Edited by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New York: Picador.
- Gazibo, Mamoudou (2005)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ransitology. Pp. 155-175 in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and Analysis*, edited by Andre Lecour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Gould, Mark (1987) *Revol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73)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 2nd ed. Frankfurt: Suhrkamp.
- Hamilton, Gary G. (1989) Heaven is High and the Emperor is Far Away: Legitimacy and Structure in the Chinese State.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84: 141-167.
- Huang, Mab (1976) *Intellectual Ferment for Political Reforms in Taiwan, 1971-1973*.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Karl, Terry Lynn,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95) From an Iron Curtain to a Paper Curtain. *Slavic Review* 54(4): 965-978.
- Knoke, David (1990) *Political Networks: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 Lears, T. J. Jackson (1985)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gemony: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3): 567-593.
- Linz, Juan (1975)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Pp. 175-411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Edited by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Luhmann, Niklas (1969) Klassische Theorie der Macht: Kritik ihrer Prämisse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16(2): 149-170.
- (1976) Generalized Media and the Problem of Contingency. Pp. 507-532 in

- Explorations in General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Essays in Honor of Talcott Parsons*, Vol. 2. Edited by Jan J. Loubser, Rainer C. Baum, Andrew Effrat, and Victor M. Lidz.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88) *Macht*, 2nd ed.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Verlag.
- (1989) *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 2nd ed. Frankfurt: Suhrkamp.
- (1991a) Soziologie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Pp. 154-177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1: Aufsätze zur Theorie sozialer Systeme*.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91b) Einführende Bemerkungen zu einer Theorie 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r Kommunikationsmedien. Pp. 170-192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2: Aufsätze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91c) Symbiotische Mechanismen. Pp. 228-244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3: Soziale System, Gesellschaft, Organisatio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94) Die Zukunft der Demokratie. Pp. 126-132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4: Beiträge zur funktionalen Differenzierung der Gesellschaft*.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95) Metamorphosen des Staates. Pp. 101-137 in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Studien zur Wissenssoziologi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vol. 4. Frankfurt: Suhrkamp.
- (1996) *Die Realität der Massenmedien*, 2nd ed.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97)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vol. 1. Frankfurt: Suhrkamp.
- (2000) *Die Politik der Gesellschaft*. Edited by André Kieserling. Frankfurt: Suhrkamp.
- Mahoney, James (2001) Path-Dependent Explanations of Regime Change: Central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6 (1): 111-141.
- Mahoney, James, and Richard Snyder (1999) Rethinking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udy of Regime Change: Rethinking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udy of Regime Chan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4(2): 3-32.
- Mann, Michael (1989)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1999) 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Edition. Pp. vii-xlii in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3) Beyond Structural Analysis: Toward a More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 Social Movements. Pp. 281-296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edited by Mario Diania and Doug McAd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John W.,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1997)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44-181.
- Meyer, Michael (1996) Der "Weise Terror" der 50er Jahre. Pp. 99-134 in *Taiwan an der Schwelle zum 21.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Probleme und Perspektiven eines asiatischen Schwellenlandes*, edited by Gunter Schubert and Axel Schneider.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 Niemeyer, Gerhard (2001) *Law Without Force: The Function of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Noelle-Neumann, Elisabeth (1979) Die Schweigespirale: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Pp. 169-203 in *Öffentlichkeit als Bedrohung: Beiträge zur empirischen Kommunikationsforschung*, 2nd ed. Freiburg: Verlag Karl Alber.
- (1994) *Öffentliche Meinung: Die Entdeckung der Schweigespirale*. (民意：沉默螺旋的發現之旅，翁秀琪等譯。台北：遠流。)
-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täheli, Urs (1998) Politik der Entparadoxisierung: Zur Artikulation von Hegemonie- und Systemtheorie. Pp. 52-66 in *Das Undarstellbare der Politik: Zur Hegemonietheorie Ernesto Laclaus*, edited by Oliver Marchart. Wien: Turia + Kant.
- Stinchcombe, Arthur L. (1968)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Strang, David (1996) Contested Sovereignt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lonial Imperialism. Pp. 22-49 in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struct*, edited by Tomas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rborn, Goran (1977)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New Left Review* 107: 3-41.
- Thomas, George M., John W. Meyer, Francisco O. Ramirez, and John Boli (1987)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Constituting Stat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Newbury Park, CA: Sage.
- Tien, Hung-mao (1989)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SMC.
- Tilly, Charles (1985)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Pp. 169-191

-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 Weber, Max (1980)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5th ed. Tübingen: J. C. B. Mohr.
- Wimmer, Hannes (1996) *Evolution der Politik: Von der Stammesgesellschaft zur modernen Demokratie*. Wien: WUV-Universitätsverlag.
- Wu, Nai-the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